

重慶

地方志

· 志鑒研究

· 文史縱橫

· 地情攬勝

· 工作動態



重慶市地方志辦公室 主辦

2026 01

總第36期 (季刊)

內部資料 免費交流

2026年重庆市地方志工作机构 主要负责人会议召开

2026年3月13日，重庆市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会议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全市地方志工作，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发展思路，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市志办主任何晓栋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志办副主任徐斌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全市地方志系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文化担当，主动服务发展大局，忠实记录时代变迁，保护传承巴渝文脉，积极传播方志智慧，在存史资政、教化育人的征程上硕果盈枝，在活化利用、服务当代的实践中成效斐然，在融合发展、数字转型的探索中形成了多元发展新格局，在全社会凝聚起读志用志新风尚。

会议明确，“十五五”时期全市地方志系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六届八次全会部署要求，紧扣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

个作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高质量推进转型升级，多角度拓展方志作用，全方位夯实发展基础，奋力开创全市地方志事业发展新局面。

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地方志事业乘势而上、提质增效的关键一年。全市地方志系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向，以精品意识夯实存史根基，以实干担当彰显服务价值，以惠民理念拓宽文化阵地，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方志力量。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地方志系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会精神。万州区、渝中区、璧山区、丰都县、秀山县、万盛经开区作交流发言。各区县（自治县）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市志办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

（供稿：市志办信息处）

责任编辑：陈欣如



何晓栋出席云阳县第三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 部署暨业务培训会

2026年3月27日，云阳县召开第三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部署暨业务培训会。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何晓栋出席会议并讲话。云阳县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王凤艳，县政府副县长邓科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副主席黄世忠出席会议。会议由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建才主持，109家承编单位分管负责人和撰稿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何晓栋对云阳县第三轮修志试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做好第三轮修志工作，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行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工程，也是地方志工作机构落实政治责任，履行法定职责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

何晓栋指出，云阳县要紧扣“出经验、出人才、出成果”的核心目标，在机制创新上先行先试、在特色彰显上打造标杆、在队伍建设与质量把控上筑牢根基，凝聚工作合力，圆满完

成试点任务，为全国第三轮修志贡献“云阳智慧”，打造“三峡库区修志样板”。市志办将以“全链条支持、全方位保障”的姿态，全力支持帮助云阳县完成第三轮修志试点任务。

王凤艳指出，做好第三轮修志工作，一要坚持质量至上，创新表达方式，真正实现志书“存史、资政、育人”的核心价值；二要紧扣时间节点，注重高效推进，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修志任务；三要突出实用导向，坚持修用并举，把“用志”贯穿修志全过程；四要强化保障支撑，凝聚工作合力，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合力攻坚”的良好工作格局。邓科对云阳县第三轮修志工作做出具体部署，强调要以高质量修志成果服务于“一地一标三区两城”现代化新云阳建设。

（供稿：云阳县地方志编纂中心）

责任编辑：张 莉





《重庆地方志》编委会

主任：何晓栋

副主任：徐斌

委员：曾伟 司逸澈 郭永彬

董宁波 熊蜀黔 夏吉敏

陈伟

《重庆地方志》编辑部

主编：徐斌

执行主编：熊蜀黔

执行副主编：陈伟

编辑：周怡彤 张莉 陈欣如

校对：黄仕洁 邱雨婷

主办：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重庆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北四支路

4号信一金典4楼

邮编：400020

联系电话：023-89075121

电子邮箱：cqdfz2017@163.com

印刷：重庆巴南彩印厂

准印证号：(渝) 2025700

CONTENTS

志鉴研究

试论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视野下新时代

地方志事业的发展····· 陈斌 (2)

地方综合年鉴编写存在的问题及其纠正····· 詹跃华 (13)

论魏晋隋唐时期“方志”观念共识和方志文献

的关系····· 任瑾洛 (22)

文史纵横

固若金汤重庆城····· 李正权 (33)

王十朋为官夔州的历史与贡献····· 谢超 (43)

300年前地契的历史解码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中那一份最早档案····· 曾向前 (47)

一份百年分家文书背后的秘密····· 费国容 (51)

地情揽胜

焦石民歌：流淌在大山深处的美妙旋律····· 冉启蕾 (54)

铁峰苍苍话“歇凤”····· 钟灵 (60)

工作动态

2026年重庆市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会议召开····· (封二)

何晓栋出席云阳县第三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

部署暨业务培训会····· (封三)

试论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视野下 新时代地方志事业的发展

陈 斌

中华民族有着 5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演化出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①，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宝藏，持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进入新时代，我们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其传承发展体系，就必须准确把握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关系，深刻认识发展新时代地方志事业的重要意义，深入剖析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存在的现实困境，探索出科学有效发展路径。

一、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涵盖了中华各族儿女在数千年的接续奋斗中，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一个行政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这样做，可以比较快地了解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千百年来，地方志与国史、家谱共同承载着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记忆与珍贵的文化财富，“史、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志、谱构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大谱系”^①。

（一）地方志是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部件”

中华民族对文化、对历史一直保持着虔诚和敬畏。自古以来，我们就有着记述历史、传承文明的习惯与自觉。即使在封建王朝时期，中华的文化、历史也从未出现过断层，在世界文明史中独树一帜。这与中国有完整的历史传承体系密不可分，与中国有着绵延数千年的修志传统紧密相关。无论是汉族统治还是少数民族当权，历朝历代都热衷于为前朝修史，以总结前朝朝政的得失。除中央政府修撰的国史之外，地方官也对编纂地方史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旧时民间竟有“七品县令三件事——收税、断案、修县志”之说。

梁启超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中国的修志起源于先秦，成熟于唐宋，繁荣于明清，至今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地方志历来都是“官修”，它通常根据行政层级分为全国一统志（元、明、清三代曾编修全国一统志）、省志、府志、县志等。志书涵盖当地沿革建置、疆域区划、山川名胜、人物艺文、风俗教育、物产地理，是名副其实的地方百

科全书。“历代志书连贯在一起，又构成了系统的地方文献与资料系统，这一文献与资料系统将历史与现实贯通起来，鉴往知来，为地方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②英国学者李约瑟曾说：“要研究人类文明和中国文化，就必须研究中国的地方志。”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其全面性、权威性、资料性具有其他资料无法替代的优势，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作用”^③，它较好地传承着一地一域的文脉，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编纂的省、市、府、州、县、乡镇各级旧志8200余种10万余卷，约占我国存世古籍的十分之一。这其中不包括各类专志、散落民间或流落海外的地方志。中华文明史上曾出现过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但没有任何一种文献能够像地方志一样，连续编纂3000余年，并持续至今。“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称：“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④这些卷帙浩繁的珍贵志书，筑成了一座资料实、历史长、层次全、涵盖广的文

①李连秀：《70年来中国方志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史志学刊》，2019年第4期，第40—47页。

②牛润珍：《略论方志文化建设与社会进步》，《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3期。

③黄文记：《浅论地方志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巴蜀史志》，2018年第2期，第52—54页。

④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6年。

化遗产宝库，是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部件”，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载体。

（二）地方志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要“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更是新时代地方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被誉为一方全史，“具有地域性、资料性、广泛性、连续性和真实性的特点”^①，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千百年来，地方志一直发挥着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忠实地记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演进，既是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部件”，也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地方志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志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第一部关于地方志的全国性法规，它开宗明义地指出，颁行《条例》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第一个全国性、规划性文件，第一次把地方志事业的发展纳入国家“四个全面”总体战略，成为国家战略在文化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就把地方志这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真正放在了国家层面的应有位置，作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大系统工程来对待。”^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踔厉奋发、锐意进取，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地方志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切实承担起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的历史责任，勇担急先锋、排头兵，“先后完成两轮修志工作，编纂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1万余部，地方综合年鉴3万余部，行业志、部门

①李会敏：《试论方志史料在区域建设中的作用——以保定为例》，《科技信息》，2012年第36期，第17页。

②段柄仁：《一份意义重大的指导性文件——学习〈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1日第10版。

志、专业志、乡镇村志 3 万余部，整理旧志 3600 余部，编写规模庞大的地情资料书，形成了海量地方志成果群，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省、市、县三级志书和年鉴全覆盖，开创了世界文化史上的盛举。”^①这数以百亿字的地方志成果，“打造了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②，有力地激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是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宝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昌盛的有力保障。

（三）地方志是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快速路”

地方志秉持“述而不论”的编纂原则，客观、系统、全面地记述一地一域的历史沿革、山川风物、地理人文等，内容横陈百科、纵贯千载、包罗万象，文化价值巨大。地方志虽然“述而不论”，但追求统一、倡导团结、鼓励奋进、兼容并蓄、知常达变、与时俱进等精神一直是其文化内核，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涵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地方志承担着“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其中，“育人”功能是指

发扬地方志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内核，对人民进行思想教化、道德感化，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凝聚干事创业的人心、共筑和衷共济的同心，从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世界文化激荡的时代大潮中，地方志是当之无愧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快速路”。

地方志能激发群众的历史意识，涵养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爱国的基础是爱家乡。“旧方志高度重视对本地文化成就的记载，大都设有关于地方文化的专志，尽量收录重要的历史文献名录、文史作品、文化名人等，有很浓的人文色彩。”^③地方志系统、客观地记述着当地厚重悠久的历史、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光荣壮烈的革命斗争事迹，以及当地人民筚路蓝缕、踔厉奋发的创业历程，反映了当地的山川风物、地理人文、文化遗存、英雄楷模、社会贤达等各个方面的真实情况，是帮助人们了解家乡历史、建立文化认同、增强振兴家乡的责任感、提升文化底蕴的不可多得的财富。“地方志记载的都是本地的人和事，用身边的人和事来教育广大人民，让大家觉得更亲切更可信”^④，

①高翔：《总结百年地方志发展成就开创服务新时代历史篇章——在全国地方志系统表彰先进会议暨 2022 年全国省级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22 年第 1 期，第 4—8 页。

②赵飞：《地方志事业全面转型升级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略论》，《史志学刊》，2018 年第 2 期，第 6 页。

③史君伟：《试论修志工作如何促进地方文化建设》，《江苏地方志》，2008 年增刊，第 87—88 页。

④史君伟：《试论修志工作如何促进地方文化建设》，《江苏地方志》，2008 年增刊，第 87—88 页。

更能激发人们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热情，是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基因，是传承中华文明的桥梁纽带，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独特风采的窗口。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指出，“希腊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正因为地方志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特异性，地方志及地方志文化在世界文化领域独具魅力。地方志越来越成为海外华人了解中国地方历史、世界学者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国外收藏中国历代方志数量十分可观，仅据美、英、日、法等8国统计，各类图书馆收藏中国方志达14000余种。”^①随着地方志的“走出去”，地方志文化的独特魅力、特殊价值不断凸显，国外一些学术机构也在逐步加强与国内地方志工作机构、地方志专家学者的交流合作。地方志也逐渐从鲜有人问的“土疙瘩”变成服务外事活动，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香饽饽”。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寻根问祖情怀。近年来，华人华侨的新生代掀起了一股寻根问祖的热潮。地方志所记载的

历史名人、姓氏源流、宗族迁徙等信息，是海外华人华侨寻根问祖的重要信息来源与珍贵的资料依据。华人华侨通过地方志了解历史、追本溯源，找到民族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是他们了解家乡、投资家乡、建设家乡的重要桥梁纽带。

二、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问题和困境

地方志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党的高度重视下，地方志事业赓续传承、传承文脉、改革创新、发展壮大，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重大成就”^②，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省市县三级有志有鉴的“两全目标”，实现了“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的千年夙愿。在志鉴成果、理论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开发利用、方志影响力等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一）地方重视不够，体制机制不顺

地方志被称为“官书”。自唐确立方志官修制度以来，历朝历代皆把修志作为地方政府的法定职责。地方志由官

^①黄禹康：《略论史志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中的作用》，《黑龙江史志》，2019年第12期，第8—15页。

^②高翔：《总结百年地方志发展成就开创服务新时代历史篇章——在全国地方志系统表彰先进会议暨2022年全国省级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22年第1期，第4—8页。

方组织、官方出资、官方编纂，成为一种历史传统，并延续至今。国务院颁布的《条例》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各级地方政府是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实施主体，地方志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基础事业，是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和发展文化事业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并通过国务院法规的形式对地方志编纂工作给予了法律保障，通过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的形式对地方志工作给予了纲领性指导和全方位的保障，尤其是“一纳入、八到位”（即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使“认识、领导、机构、编制、经费、设施、规划、工作”到位）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政府在地方志事业发展上必须履行的职责。

但是，有的部门和地方领导重视经济增长等硬指标、显业绩，对地方志这种软事业、冷部门重视不够，机构、编制、经费、规划等保障不到位，影响和制约了地方志事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各地对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性认识参

差不齐，有些地区将地方志工作机构与其他部门进行合并，甚至直接取缔。“地方志管理主体不统一，被边缘化、弱化的现象十分突出。”^①一是机构名称五花八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300多个地级行政区、30多个省级行政区的地方志工作机构名称多达50余种。比如，同为省级机构，江西、安徽叫“地方志研究院”，湖南叫“地方志编纂院”，广东叫“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福建叫“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市、县一级机构名称就更加杂乱无章，以江西为例，江西省省、市、县三级112家地方志工作机构中，名称已有“地方志研究院”“史志办公室”“史志研究室”“史志档案馆”“史志编纂研究中心”“党史党建发展中心”等六七种之多。二是机构级别上下不一。仍以省级机构为例，江西、河南是副厅级，湖南、福建是正厅级，河北、宁夏是正处级。三是归属管理主体不统一。有的归属党委，有的归属政府，甚至有的归属地方社科院、文旅厅。如，江西同时归口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管理，宁夏、浙江归口社科院管理，湖北归口湖北省文旅厅管理（由厅内设地方志工作处来负责统筹、指导全省的地方志工作）。地方志工作的有序开展依赖于行政力量的推动，宁夏、浙江等地的地方志工作归口不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管理，

^①刘玉宏：《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经验、问题及对策》，《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让原本就处于弱势、边缘位置的地方志工作变得更加难于开展。四是单位性质不一致。全国上下各级机构有的为行政机关、有的为参公管理单位、有的为事业单位。仍以江西为例，江西省省、市、县三级 112 家地方志工作机构中，参公管理 73 家，事业单位 34 家，未定性质 5 家（该统计数据截止 2022 年 2 月）。《条例》赋予了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等行政职能，但按照机构改革后“事业单位不再承担行政职能”的相关规定，原则上转为事业单位的地方志工作机构就无法履行对相关单位的督促、检查等行政职能，这必然导致地方志工作的推动力度大幅度下降，使地方志工作难以开展，地方志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功能难以发挥。

（二）社会参与不够，成果转化率低

地方志是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部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快速路”，承担着夯实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历史责任。大力发展新时代地方志事业，从方志的视角讲述新时代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的伟大奋斗历程，

是各级政府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也是党和国家、全国人民的共同期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须充分激发十四亿中国人民的主观能动性。”^①地方志历来就是官方组织、官方修纂的“官书”，《条例》的颁布进一步从法规层面明确了地方志的官修性质及其组织形式。民间力量参与编纂志鉴缺乏法律法规层面的依据，缺乏政策上的支撑，也缺乏舆论上的引导。这导致长期以来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成了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私家任务”，普通老百姓对地方志的了解非常有限，甚至大部分政府官员、学者对地方志的认知也不够到位，对地方志及其内涵、价值的重视不够，甚至有部分政府官员认为修志编鉴是可有可无的“苦差事”“冷板凳”，不值得耗费过多的时间与精力。

社会参与度过于低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修志编鉴成了系统内的“闭门造车”，编纂出来的志鉴也是“墙内开花墙内香”，老百姓很少能接触到，甚至是很少能关注到。志鉴成果的展现形式也与老百姓的日常阅读、使用习惯大相径庭，除了极少数方志研究者外，很少有普通老百姓对枯燥乏味且冷门的“大部头”感兴趣。这使得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耗费青春、耗尽精力、辛辛苦苦编纂

^①张璐、许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 年第 3 期，第 7 页。

出来的志鉴成果很快就被束之高阁，或藏于各单位书库，或藏于各地图书馆内比较隐蔽的角落，应有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这些被方志人视若珍宝的心血成果，最终只是成为某地图书出版史或者文化发展史上一串冰冷而没有多大价值的数字。仍以江西为例，江西是志书编纂大省，地方志编纂始于三国吴时，至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期间共修志1000多次，编纂志书（政区志）约1190种，数量位居全国第二；现存旧志约52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8200种的6.4%，位居全国第四，是珍贵的文化宝藏。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江西开展了首轮省志的编纂工作，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共编纂出有88部分志共6600万字的首轮《江西省志》。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的一项空前浩大的文化工程，首轮《江西省志》的完成极大丰富了江西省的历史文化宝库。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样一项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对江西省情、地情进行的一次系统、全面、深入的大调查的宝贵成果，却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首轮《江西省志》集结出版后，除了赠予相关单位外，其余大部分成了江西省方志馆的馆藏资源，被束之高阁，几乎无人问津。尽管江西省方志馆、江西省图书馆等地藏有不少江西旧志、新编方志资料，但其中绝大部分

只是作为“馆藏”的一部分躺在角落里，人民群众、社会各界、省内省外对其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用方志文化讲述江西故事、传播江西文化发展理念、树立江西文化形象等深层次应用。本该成为江西优秀传统文化名片的江西方志文化，在向全国、向世界推介江西的过程中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给人一种“身入宝山而空手回”的遗憾。

修志为用、修用并举，是编纂志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地方志资料文献有着其他资料无法比拟的宝贵价值，但如何充分发挥地方志的价值，让其“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其真正成为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巨大助力，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的课题。

（三）人才建设不够，发展理念脱节

志鉴编纂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活，需要专业的人才来从事这项工作。同时，志鉴编纂又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经过两轮修志，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架构不断完善，人才队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壮大，队伍专业程度在不断提高，专家学者的比例也逐步提高。原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高翔在讲话中指出，“目前，全国共有省、市、县三级地方志工作机构3000余个，在编人员2.6万余人。”^①这是一

^①高翔：《总结百年地方志发展成就开创服务新时代历史篇章——在全国地方志系统表彰先进会议暨2022年全国省级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2022年第1期，第4—8页。

组喜人的数据，但是透过这组数据，我们应该看到各地地方志工作机构发展不平衡、地方志专业力量仍然薄弱的事实。全国 3000 余个地方志工作机构 2.6 万在编人员，平均每个机构 8 人左右。以江西为例，截至 2022 年 2 月，江西 112 个地方志工作机构实有工作人员 1000 余人，其中实际从事地方志工作的仅有 400 余人，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平均每个机构 4 人左右。这些实际从业人员中既懂管理又懂业务的数量偏少，特别是专家型人才更少；人员结构偏老化（有些是退休返聘人员），一些人员专业水平和能力与新时代要求存在一定差距；驻村帮扶、招商引资等中心工作繁重，专门用于从事地方志工作的时间十分有限；相当一部分人是被安排到地方志这个“冷衙门”来过渡，甚至是养老退休，这部分人对地方志缺乏认同感和自豪感，没有形成支撑事业发展的自信心。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方志人才队伍建设，地方志专业队伍整体力量薄弱事实凸显。

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关键，创新是灵魂。伴随人才队伍建设不足而来的是部分地区发展理念的落后、与时代脱节。主要表现在缺乏“定准位”的智慧和“走出去”的勇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迅速增长，简单、传统、枯燥的文化产品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需求，人民群众渴求短平快、接地气、应潮流的文化“快消品”。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拥有当地最富集、最全面的历史文化资源，理应乘势而上，顺应时代需求，迅速推出一大批符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志鉴产品。但是大部分地区仍然固守“一本书主义”，守在书斋里“孤芳自赏”，看不见把互联网、新媒体、短视频等新兴技术形式与地方志资源结合起来的优势与价值，未能顺应新媒体时代舆论传播格局，未能积极开发、开辟更多多元化的新媒体时代志鉴产品。有些地方虽然也已经开始尝试一些新的传播、宣传方式，但不管是从量还是质的角度来看，这些创新探索还停留在比较粗浅的阶段。“方志资源开发利用不到位，主动服务的意识不强，服务的手段单一，方志文化产品单调、质量不高，守着金山要饭吃。”^①

三、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学习习近平总

^①左健伟：《新时代地方志的初心使命与高质量发展》，《江苏地方志》，2019 年第 5 期。

书记关于史志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分析地方志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境，研究出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构建地方志事业新发展格局，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方志力量。

（一）推动地方志立法，建立健全保障体系

“依法治志是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保障。”^①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修志工作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条例》作为政府规章，无法规范党委、人大、政协等有关部门修志工作。一个地区的地方志事业发展是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领导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视程度。因为没有《地方志法》等法律的硬性规定，地方志工作机构被随意撤并的现象普遍存在，各地各级机构归口管理单位五花八门，单位规格、单位性质、人员编制上下各不相同，各地制度保障体系千差万别，地方志工作者的积极性、事业发展的稳定性都因此受到影响。比如，因为有《档案法》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各地各级档案局能比较顺利地推动各项工作开展。因此，推动地方志立法，可以从国家法律层面对地方志事业的发展给予保障，“实现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常态化、制度化、法

治化”^②，切实建立起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配齐配强地方志工作机构，充分保障工作经费，让地方志事业真正能够融入社会发展大局，可以更好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服务中心工作，主动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地方志要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真正的作用，必须要立足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文化需要，做好“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这一篇大文章，做好新时代的忠实记录者，担负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一是充分发挥信息多、地情通、联系广的优势，在编纂志鉴的同时探索一些符合人民需求的志鉴类产品（如，江西新余的“工小美系列丛书”，四川成都的《成都风物》、江苏南京的《南京印记》等地情读物）。二是充分发挥地方志在旅游开发、城市建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当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地情服务专家，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服务。三是变史料为活信息，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滞后服务为超前服务，主动融

①冀祥德：《论依法治志》，《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5期，第12页。

②刘玉宏：《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经验、问题及对策》，《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入国民文化教育、爱国教育等各个方面，编写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通俗书籍或者地情读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普及。

（三）创新发展理念，构建多元发展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突出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进入新时代，地方志事业迎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要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必须积极探索新时期地方志工作的新途径、新模式；必须主动拓展事业领域，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成果形式，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必须明确工作重点，勇于善于作为，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和文旅融合发展上下功夫，积极构建地方志事业新发展格局。一是加强方志队伍建设，培养方志专业人才。事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必须大力培养高素质的方志专业人才，编纂出合乎规范、合乎体例的精品志鉴产品，深入挖掘地方志资源宝库，开发利用好方志成果，服务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必须着力培养能够与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深入沟通、有效协调的管理人才，提高地方志事业在各级政府领导、有关部门领导心中的分量，真正推动地方志与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相融合，发挥地方志

在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方面应有的作用。二是抓好地方志文化、地情文化挖掘整理和提炼加工，打造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方志品牌。要顺应新媒体时代传播格局，创新宣传方式，积极开发、开辟更多元化的新媒体宣传阵地；要加强与本地媒体的沟通合作，通过合办特色栏目等形式，形成宣传地方文化的合力。三是积极推动各级方志馆、村史馆的建设，努力让方志馆、村史馆成为展示市情县情乡情、培育家国情怀、树立方志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四是积极开展古籍、旧志的点校整理，挖掘其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切实发挥地方志文化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作用。

地方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传承好、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一个地方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立足新时代，我们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历史机遇，积极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利用，全面推动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志”力。

（作者单位：江西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责任编辑：熊蜀黔

地方综合年鉴编写存在的问题及其纠正

詹跃华

地方综合年鉴（简称年鉴）是众手成书，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由于撰稿人和编纂人员的编写水平参差不齐，加之时间所限，打磨不足，导致年鉴稿件存在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就会严重影响年鉴质量。年鉴稿件中的问题涉及面广，梳理归纳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拟从篇目、条目、内容三个方面，将一些容易忽视且必须纠正的问题例举如下，以供撰稿人和编纂人员参考，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问题。

一、年鉴篇目问题

年鉴篇目结构一般分为类目、分目、条目三个层次，极少数分为四个层次，甚至五个层次。篇目问题主要体现在类目、分目、条目的归类不当、排序混乱等方面。

（一）归类不当

类目归类不当。把属于政治部类的类目放入经济部类，经济部类的类目放入文化部类，文化部类的类目放入社会部类等，造成归类不当。如某年鉴在文化部类中设置旅游业类目，其文化部类由科学技术、文化、旅游业、教育、卫

生健康、体育等类目组成。这种把旅游业归入文化部类的做法不妥，虽然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与旅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旅游业是一种新型服务业，属于第三产业，不宜归入文化部类，而应归入经济部类，置于商贸服务业类目之后、金融业类目之前。

分目归类不当。把类目无法统辖的分目，强行放入该类目，导致归类不当。如某年鉴把不属于人民团体类目的文联、残联、红十字会等分目，放入人民团体类目。2020年12月30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简称《补充规定》）第十条规定：“以‘人民团体’立目，应当记述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可见，文联、残联、红十字会均不属于人民团体，不宜归入人

民团体类目。群众团体包括人民团体和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文联、残联、红十字会等组织，群众团体与人民团体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应把人民团体类目改为群众团体类目。又如某年鉴农业类目下设乡村振兴分目，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农业与乡村振兴存在交叉关系，但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农业包含不了乡村振兴内容，应把农业类目改为农业农村类目或分别设置农业类目、乡村振兴类目；就业类目下设人才人事分目，按照社会分工属性，应把人才人事分目的人才内容归入党委类目组织建设分目，人事内容归入政府类目人事工作分目。

条目归类不当。把属于此分目领属的条目放入彼分目，致使彼分目领属不了，而引起归类不当。如某年鉴政协类目民主监督分目下设提案评选表彰，提案是政协委员，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政协各专门委员会，政协全体会议期间的界别、委员小组，向政协全体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提出并交提案审查委员会或者提案委员会审查的书面意见和建议，提案评选表彰不属于民主监督工作，应归入政协类目委员工作分目。又如某年鉴旅游业类目旅游资源分目下设旅游项目建设，旅游项目建设属于旅游规划建设，应归入旅游规划建设分目。

（二）排序混乱

类目排序混乱。各类目的排列顺序

比较随意，没有逻辑性。如某年鉴政治部类把民主党派类目排在群众团体类目之后，有失妥当。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按照其职能和所处地位，应排在政协类目之后、群众团体之前。又如某年鉴经济部类把金融业类目放在经济管理类目之后，经济管理类目之前为商贸服务业、房地产业等类目，商贸服务业、房地产业均属于第三产业，金融业也属于第三产业，金融业类目应排在第三产业之末、经济管理类目之前，以免割裂第三产业。

分目排序混乱。类目下各分目的排列顺序没有章法。如某年鉴法治类目设人大立法、政法委与社会治理、法治政府建设、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仲裁8个分目，其中法院、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的排序欠妥。按照办案程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提起公诉后由法院审判，法院判决生效后将罪犯交付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监狱执行刑罚，应调整为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的顺序。又如某年鉴群众团体类目设总工会、共青团、青联、妇联、文联、作协、科协、侨联、台联、贸促会、残联、红十字会12个分目，分目排序不妥。《补充规定》第十条规定：“以‘群众团体’立目，应当记述上述人民团体和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法学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欧美同学会、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按照规定中的排序,应调整为总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台联、青联、文联、作协、贸促会、残联、红十字会的顺序。

条目排序混乱。分目下各条目的排列顺序杂乱无章。如某年鉴文化类目文化产业分目设概况,文化产业数字化推动,参展第十八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动漫产业,电影产业,开放办影战略实施,广电集约化经营7个条目。其中,概况、文化产业数字化推动、动漫产业、电影产业、开放办影战略实施、广电集约化经营属于综合性条目,参展第十八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属于单一性条目。按照《补充规定》第十九条“年鉴类目、分目、条目应当编排有序。条目编排一般综合性条目在前,单一性条目在后”的规定,应调整为概况、文化产业数字化推动、动漫产业、电影产业、开放办影战略实施、广电集约化经营、参展第十八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的顺序。

二、年鉴条目问题

条目是年鉴记载事物的主体,年鉴条目由标题和内容(释文)构成。条目问题主要体现在标题制作不规范、内容要素残缺、无用信息太多等方面。

(一) 条目标题制作不规范

总结式标题。条目标题使用工作总结式词语,总结痕迹过重。如某年鉴农业类目农业机械化分目下的条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不断优化”,标题具有总结性质,按照《补充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条目标题不得使用总结式表述方式,应改为“农机政策落实”。又如某年鉴文化类目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分目下的条目“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标题也具有总结性质,应改为“文物保护工作”。

新闻式标题。条目标题使用指代不明的新闻式标题。如某年鉴市县发展类目某市分目下的条目“某市迈入高铁新时代”,属于指代不明的新闻式标题,其内容记述某市高铁站建成启用的情况,应改为“某市高铁站建成启用”。又如某年鉴商贸服务业类目会展业分目下的条目“第21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在景德镇陶博城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该标题虽然也是新闻式标题,但指代明确具体,只要删除标题中的修饰词“隆重”就可用作条目标题。

口号式标题。条目标题使用工作口号、工作部署用语。如某年鉴文化类目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分目下的条目“考古工作打开新局面”“革命文物保护管理再上新台阶”,标题均具有工作口号性质,按照《补充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条目标题不得使用口号式表述方式,应分别改为“考古发掘”“革命文物保护管理”。又如某年鉴文化类目赣鄱文化传承创新分目下的条目“统筹谋划文化高质量发展新蓝图”“推动艺术创作展现新气象”,

标题也都具有工作口号性质，应分别改为“赣鄱文化传承发展规划”“赣鄱文化艺术创作”。

抽象化标题。条目标题比较抽象，没有标出具体的事实信息。如某年鉴乡村振兴类目乡村治理分目下的条目“强化示范引领”“提升治理效能”，标题比较抽象，读者不看内容就不知道条目讲的是什么，按照《补充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条目标题应当准确概括条目中心内容，依据条目标题记述的内容，应分别改为“示范村镇创建”“积分制清单制推广应用”。又如某年鉴文化类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分目下的条目“推进系统性保护”，标题也比较抽象，根据条目标题记述的内容，应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动宾式标题。条目标题过多使用动宾结构，中心词未前置。如某年鉴交通类目水路分目下的条目“签订共同推进赣粤运河前期工作备忘录”，标题是动宾结构，中心词“赣粤运河前期工作备忘录”没有前置，按照《补充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条目标题的中心词一般应前置，应改为“赣粤运河前期工作备忘录签订”。又如某年鉴教育类目义务教育分目下的条目“优化县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标题也是动宾结构，应改为“县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优化”。

残缺式标题。条目标题要素不全，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事实信息。如某年鉴交通类目公路分目下的条目“公路桥梁和隧道”“农村公路”，这两个条目

的标题要素不全，没有标出事物的状态（怎么样），告诉读者的信息不够完整准确，标题末尾应分别加上“建设”二字，即“公路桥梁和隧道建设”“农村公路建设”。

（二）条目内容要素残缺

综合记事条目要素残缺。具体表现在时间、地点、部门（事主）、范围、主要过程及结果等要素残缺不全。一是缺少事物过程。某年鉴哲学社会科学类目学术成果与奖励分目下的条目“省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记述：“2024年，省社科联在全省开展省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工作，共立项438项。其中，重点项目37项，每项资助经费3万元；一般项目126项，每项资助经费1万元；青年项目186项，每项资助经费1万元；联合资助项目89项，省社科联资助经费2000元/项，责任单位资助8000元/项。省社科联资助经费共440.8万元。”该条目标题记述省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有时间、地点、部门（事主）、范围和结果，但缺少项目立项的过程，需要补写。二是缺少事物结果。如某年鉴文化艺术类目文化市场分目下的条目“开展无照经营网吧专项整治”记述：“11月，省文旅厅联合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通信管理局等单位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无照经营网吧专项整治工作，并要求各地适当放宽总量，改进网吧区域布局和准入政策的同时，依法开展单体网吧审批。”该条目标题记述组织开展无照经营网吧专项整治，有时间、地点、部门（事主）、

范围和过程，但缺少专项整治的结果，需要补写。

单一性条目内容要素残缺。具体表现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等基本要素残缺不全。一是缺少时间要素。如某年鉴文化艺术类目社会文化分目下的条目“开展‘永远跟党走’全省广场舞展演活动”记述：“开展‘永远跟党走’全省广场舞展演活动，采取‘层层发动、逐级选拔、全省联动’的形式，基层团队踊跃报名，参演团队达3000余支……评选出一等奖4个、二等奖6个、三等奖10个。”该条目记述“永远跟党走”全省广场舞展演活动，有活动的地点、组织形式、参加对象、结果等要素，但缺少活动的起始时间及举办方，需要补写。二是缺少地点要素。如某年鉴科学技术类目技术市场分目下的条目“举办2021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江西企业创新方法区域赛决赛”记述：“10月15—16日，省科协、省科技厅联合主办2021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江西企业创新方法区域赛决赛。全省各企业40个项目入围决赛，32个团队参加决赛……评出江西省区域赛一等奖6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16名。”该条目记述2021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江西企业创新方法区域赛决赛，有决赛的时间、举办方、参加对象、结果等要素，但缺少决赛举行的地点，需要补写。三是缺少人物（事主或举办方）要素。如某年鉴农业农村类目林业分目下的条目“举办中国（赣州）第八届家具产业博览会”记述：“4月28日，中

国（赣州）第八届家具产业博览会在南康家居小镇开幕……展会期间，观展人数超18万人，线上线下交易额突破150亿元。”该条目记述中国（赣州）第八届家具产业博览会，有博览会举办的时间、地点和参加对象、组织形式、结果等要素，但缺少博览会的举办方，需要补写。四是缺少事件（事物）结果要素。某年鉴体育类目群众体育分目下的条目“2024年全国跳伞锦标赛”记述：“11月30日，2024年全国跳伞锦标赛在吉安开赛，来自江西、北京、山西、湖北等7个省市的8支代表队100余名跳伞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主办，设11个竞赛组别，共有特技、定点、全能、造型、踩伞、伞翼飞行、自选花样7个大项。”该条目记述2024年全国跳伞锦标赛，有锦标赛开赛的时间、地点、参加对象、举办方等要素，但缺少锦标赛获奖的结果，需要补写。

（三）条目无用信息太多

空话套话太多。如某年鉴应急管理类目消防救援分目下的条目“概况”记述：“2024年，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省消防救援总队深入贯彻……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负重拼搏、真抓实干，守土担责防风险、保平安、护稳定，尽心竭力优服务、惠民生、促发展，较好完成消防救援各项工作，队伍建设迈出新步伐……全省队伍接处警情8.14万起（其中火灾扑救2.88万起），出动消防车17.9万辆次、指战员109.5万人次，

营救和疏散遇险被困群众 1.45 万人，保护财产价值 82.5 亿元。”其中“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省消防救援总队深入贯彻……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负重拼搏、真抓实干，守土担责防风险、保平安、护稳定，尽心竭力优质服务、惠民生、促发展，较好完成消防救援各项工作，队伍建设迈出新步伐”属于空话套话，没有信息价值，可以删除。

内部事务太多。如某年鉴党委类目台湾事务分目下的条目“概况”记述：“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对台工作队伍。……制定完善涉及机关党建、党风廉政、政务财务等方面的 20 个制度规定，编印《省委台办规范高效工作制度汇编》，发放给每个干部职工，进一步扎紧制度‘篱笆’。”按照《补充规定》第十八条“年鉴应当注重记述部门单位的主要职能工作……不记述单位内部机关党建、宣传信息、队伍建设、后勤保障等非主要职能信息”的规定，该条目所述的机关建设、党风廉政、政务财务等内容属于省台办的内部事务，是为做好省台办所承担的主要职能工作服务，无须记述，可以删除。

三、年鉴内容问题

年鉴内容记述应当综合运用多种表现形式，反映年度内各部门（单位）、各行业、各领域发展变化的情况。内容问题主要体现在不同部门（单位）、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交叉重复、相互抵牾、涉敏涉密等方面。

（一）内容交叉重复

条目与类目内容交叉重复。某一类目下分目领属的条目与另一类目内容交叉重复。如某年鉴文化类目赣鄱文化传承创新分目下的条目“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与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类目内容交叉重复，类目内容比条目更加全面完整，该条目可以删除。

条目与条目内容交叉重复。主要有同一类目不同分目下的条目内容重复、不同类目下分目领属的条目内容重复两种情形。一是同一类目不同分目下的条目内容重复。如某年鉴人大类目重要会议分目下的条目“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记述每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主持人、参会人员（出席人员、列席人员）和会议主要内容，包括人事任免事项；人大类目选举和任免分目下的条目“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也记述省人大常委会每次会议的人事任免事项。这两个条目的内容存在交叉重复，可以采取各有侧重的记述方法，如“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侧重记述会议的学习和讨论、研究、通过的事项，不记会议决定的人事任免事项，而“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侧重记述人事任免事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二是不同类目下分目领属的条目内容重复。如某年鉴哲学社会科学类目学术活动分目下的条目“纪念安源党校建校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与市县发展类目某市分目下的条目“纪念安源党校建校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内容交叉重

复，前者是主办方，后者是主办方和举办地，应删除一处，内容可以相互充实，使条目内容更加完整。

（二）内容相互抵牾

事物与实际抵牾。所记事物与实际不相符。如某年鉴市县发展类目某市分目下的条目“永磁磁浮轨道交通工程试验线在某县投入使用”记述：“8月9日，永磁磁浮轨道交通工程试验线在某县投入使用，运行列车被命名为‘兴国号’。通车试验由某大学牵头，某县政府联合中铁六院、中铁工业、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等单位共同研制完成。这是世界第一条投入使用的永磁磁浮空轨试验线。”其中“世界第一条投入使用的永磁磁浮空轨试验线”，经查，“世界第一条”无从考证，应为“中国第一条”。又如某年鉴省情概况类目自然地理分目下的条目“区域位置”记述：“省境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东西宽约490千米，南北长约620千米，辖区总面积16.69平方米，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74%。”其中“辖区总面积16.69平方米”明显不切合实际，一个县（市、区）的总面积一般也有1000平方米以上，更何况一个省的总面积呢，应是漏掉一个“万”字，核实后改正。

数据与数据抵牾。主要有同一数据前后出现不一致、数据总项与分项之和不等两种情形。一是同一数据前后出现不一致，如某年鉴省情概况类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分目下的条目“农业”记述：“全年全省粮食产量2192.3万吨，

比上年增长1.3%……茶叶产量7.4万吨，增长3.1%……”而农业农村类目综述分目下的条目“农业供给质量提高”记述：“……茶叶种植面积达到12.8万公顷、产量8万吨，中药材种植面积21.07万公顷（含林下药材），产量约67万吨。”茶叶产量前后抵牾，其中必有一个错误，经找农业部门核实，确定茶叶产量为7.4万吨。二是数据总项与分项之和不等，如某年鉴市县发展类目某市分目某县条目记述：“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64.5亿元，同比增长8.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8.47亿元，增长6.7%；第二产业增加值22.53亿元，增长6.3%；第三产业增加值3.35亿元，增长10.2%……”该条目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等于34.35亿元，而地区生产总值64.5亿元，三个分项之和远远小于总项，应找统计部门核实数据。

时间与时间抵牾。同一事物在不同类目中出现，其发生的时间不一致。如某年鉴大事记类目记述：“10月18—24日，2021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在景德镇市举行。”而工业类目轻工业分目下的条目“2021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召开”记述：“10月18—22日，2021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在景德镇市召开。博览会……”2021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举行的时间，在前后出现有出入，经与举办部门核实，时间应为10月18—24日。

（三）内容涉敏涉密

记述敏感事物主要有港澳台不规范

和进京访等内容，记述涉密事物主要有征兵人数、退役军人接收安置人数，军民融合具体内容，储备粮数量、规模，人防工程数量、面积等内容。

记述港澳台不规范，涉及国家主权。一是在港澳台记述上，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能直接与其他主权国家并列，需要并列时应改为中国港澳台地区。如某年鉴特载类目收录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内容名词注释：“组织省内重点景区赴港澳、东南亚、日韩等地举办‘如画江西 风景独好’海外文旅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其中“港澳、东南亚、日韩等地”应改为“中国港澳地区及东南亚、日韩等地”。二是港澳台同胞不是海外侨胞，不能混为一谈。如某年鉴党委类目统战工作分目下的条目“思想政治工作”记述：“持续开展民营经济人士‘井冈红’理想信念教育活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凝聚新力量·逐梦新时代’主题教育、港澳台侨‘同根·同梦’主题教育。”其中“港澳台侨”应改为“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三是在涉外法治中不可记述港澳台，港澳台案件不属于涉外案件。如某年鉴法治类目仲裁分目下的条目“涉外服务”记述：“全行业受理涉外（含港澳台）案件13件，涉案标的额7.2亿元。”其中“涉外（含港澳台）案件”应改为“涉外及港澳台案件”。四是港澳台商不是外商，港澳台商投资不能称外资，其投资的项目也不能称外商投资项目。如某年鉴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类目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分目下的条目“贸易投资”记述：“引进共建国家（含港澳台）外商投资项目263个，在全省投资6.5亿美元，占全省利用外资的88.6%。”其中“共建国家（含港澳台）外商投资项目”应改为“共建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投资项目”，“外资”应改为“外资和港澳台资”或分设“外资”“港澳台资”。五是香港为地区航线，不是国际航线，开往香港的航线不能称国际航线。如某年鉴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类目国际贸易促进分目下的条目“平台联动”记述：“保障全国首条直飞挪威全货运航线开通，支持吉隆坡、中国香港等6条国际客运航线复航……”其中“国际客运航线”应改为“国际（地区）客运航线”。六是在国内语境下，港澳台前不加“中国”二字。如某年鉴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类目陶瓷文化交流合作分目下的条目“概况”记述：“前往北京、中国澳门、顺德、深圳、潍坊、长沙、武汉等地，组织参与文化交流活动10余次。”其中“前往北京、中国澳门、顺德、深圳、潍坊、长沙、武汉等地”应改为“前往北京、澳门、顺德、深圳、潍坊、长沙、武汉等地”。

记述进京访等敏感内容。如某年鉴党委类目信访工作分目下的条目“概况”记述：“全年信访总量同比下降29.82%；国家信访局登记该地信访量同比下降21.13%；群众进京走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下降17.26%、22.6%……”其中“群众进京走访批次、人次同比分

别下降 17.26%、22.6%”属于敏感内容，应该删除。

记述征兵人数、退役军人接收安置人数，属于涉密。如某年鉴军事类目退役军人事务分目下的条目“移交安置”记述：“2024 年，全省 327 名团级及以下转业军官，有 324 人选择到党政机关和参公单位安置，占 99.1%（3 人自愿选择到事业单位安置）；接收安排退役士兵 1756 人，选择到机关事业单位安置的占 91.57%；接收军队离退休人员 67 人、逐月领取退役金人员 17 人、复员军官 18 人、残疾士兵 18 人，实现部队、退役军人和接收单位三方满意。”条目中所列数据涉密，应作妥善处理，处理后的内容应为：“2024 年，全省团级及以下转业军官有多人选择到党政机关和参公单位安置，3 人自愿选择到事业单位安置；接收安排退役士兵多人；接收军队离退休人员、逐月领取退役金人员、复员军官、残疾士兵，实现部队、退役军人和接收单位三方满意。”

记述军民融合的具体内容，属于涉密。如某年鉴工业类目航空船舶产业分目下的条目“航空产业平台”记述：“某航空大学、602 所等单位推进直升机应急漂浮、除防冰系统适航审定技术等民航安全基金项目研究，开展军民融合符合性方法研究横向课题，预先完成复杂燃滑油系统等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服务地方航空产业发展。”其中“开展军民融合符合性方法研究横向课题”属于军民融合的具体内容，应该删除。

记述储备粮数量、规模，属于涉密。如某年鉴商贸服务业类目粮食流通分目下的条目“概况”记述：“2021 年，全省粮食库存 1035 万吨，处历史高位。年粮食收购总量 953.5 万吨，年外销稻谷超 600 万吨。新增 30 万吨地方储备粮，总规模 200 万吨。粮油加工业总产值 1000.3 亿元。”其中，“全省粮食库存 1035 万吨，处历史高位”涉密，应改为“全省粮食库存处历史高位”；原文中的“新增 30 万吨地方储备粮，总规模 200 万吨”涉密，应该删除。

记述人防工程数量、面积，属于涉密。如某年鉴城市建设与管理类目城市规划分目下的条目“地下空间规划”记述：“7 个设区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总建筑面积 5665 万平方米，其中地下人防工程面积 1041 万平方米，地下动静态交通空间（地下停车场、轨道交通、隧道等）3829 万平方米，地下市政空间 83 万平方米，地下商（公）服空间 677 万平方米，地下仓储物流空间 29 万平方米，其他地下空间 6 万平方米。”其中“地下人防工程面积 1041 万平方米”涉密，应该删除。

以上所述年鉴稿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撰稿人和编纂人员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及时纠正，力争把问题消灭在年鉴出版之前，使出版后的年鉴少留或不留遗憾。

（作者单位：江西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责任编辑：陈伟

论魏晋隋唐时期“方志”观念共识和方志文献的关系

任瑾洛

一、引言

过往方志流变研究，点出《周礼》有方志记载后，随后重点落在各历史时期方志的实际形式，包括地记、图经、地志、图志、地境等，一般通过地记、图经、方志的发展脉络，论证相互关系，有的也引述宋元明清时代的文献加以论证。现今多数学者均认为魏晋方志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地记，隋唐方志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图经，或者认为地记、图经是方志的前身、过渡形式。这毕竟是近古或今人的观点，而中古之人在编纂和使用地记、图经时，是否认为这些图书属于方志？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问题。

《周礼》面世后，中古时期的人是否认同“方志”这一词汇所代称的实物就是地记、图经等，即魏晋、隋唐时期的方志观念共识问题。倘若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那么无论近人如何看待魏晋地记、隋唐图经这些文献的一脉相承，它们究竟是否属于方志就依然能成为一个学术争议。

中华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汉语词汇的含义也是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不断演变。在研究一门学问时，自然要厘清这一词汇的古今差别。譬如研究经济，第一课就需要说清楚“经济”这一词汇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内涵。这是不证而明的道理，方志也不外乎如此。“方志”这一词汇，自两千年前出现时，已经是指代一种记述性的文献，但其指代的具体对象在历史长河中是否存在变化？魏晋和隋唐时期的方志观念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前数字化时代似乎因资料匮乏或前人无意做寻章摘句的功夫，很难清晰予以证明。现下，历史语义已经成为一门学科，文献检索的方式也有了长足进步，就应该探讨清楚这一课题。

宋元以降，文献资料较多，且出现了流传至今的成熟方志作品，其方志观念明显可知，与今天几乎没有差异。因此，讨论方志的名与实这一问题，主要是集中于魏晋和隋唐两个时期。

诚然，今人所认为的方志到南宋时

期才定型。“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①，但切不可因此认定成熟的方志观念到宋代才出现。实际上，通过对流传至今的多种古籍内容进行检索，并结合上下文开展语义、语境分析，可知，“方志”观念也同方志的实际形式一般，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嬗递。魏晋时期方志观念共识已萌芽，唐代就已出现了非常明确的方志观念共识。

二、魏晋时期方志观念共识的萌芽

谈到方志观念，必然要从《周礼·地官司徒》的记载说起，“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②但《周礼》一书，可能并非周代真实存在的官制，而是一种古人的理想国。《周礼》作为古文经，在群经中问世最晚、传承谱系不明，其发现过程亦众说纷纭，堪称著名学术公案。相关论争，自其行世伊始便已肇端。历代对于《周礼》的作者、成书年代和真实性争论不休。欧阳修、苏辙等人均对《周礼》提出过质疑，清代及民国时期对周礼的真伪考辨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周礼》已经是公认的托古之作，黄苇、仓修良等学者在论述方志起源时，已表达过类似观点。^③诸子文献关于“志”的记载略有几处，如“军志”“礼志”“仲虺之志”等^④，但“方志”的记载仅《周

礼》一例。因此，周礼所称“方志”，在先秦时期可能并无实际文献。郑玄对“外史”官职“掌四方之志”一句作注，“志，记也。谓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祷机”^⑤。按郑玄之意，外史所掌四方之志，即邦国之史。可见，即使到了东汉时期，虽已有全国性的汉书十志，但此时的志只是史的一种体裁，“四方之志”仍是一种不常见的文艺体例，否则不需要特别注释。因而，此时虽出现“方志”二字记载，但不可认为已经出现方志观念共识，魏晋以前，只能算是方志观念的结胎时代。

尽管《周礼》内容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周礼》对历代政治文化体系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隋唐时期定型的六部制度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可能也正是因为《周礼》出现“方志”二字的影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观念明显于此时萌芽。这一时期的《三都赋》《水经注》《后汉书》《魏书》等文献作品中出现“方志”的次数增多就是明证。

（一）《三都赋》中的方志观念

左思《三都赋》言及方志两次。其一为《三都赋·序》，“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

①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0月，第2页。

②东汉郑玄注释，唐代贾公彦疏，唐代陆德明释文：《附释音周礼注疏》卷第十六，元刊本，第10页。

③吕志毅：《方志起源研究》，《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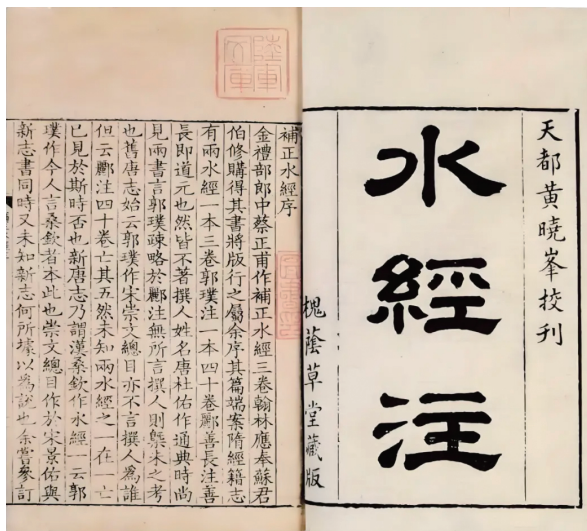
④张海波等，《先秦志书源流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4期。

⑤东汉郑玄注释，唐代贾公彦疏，唐代陆德明释文：《附释音周礼注疏》卷第二十六，元刊本，第26页。

兽草木则验之方志”^①，即参考方志记载的鸟兽草木进行文学创作。其二为《三都赋·吴都赋》，“方志所辨，中州所羨。”^②结合上下文理解此句大意为，各种奇花异草，夏季繁茂，冬季翠绿，这是吴地方志记载的，为中原之地所叹羨。《三都赋》只有一万余字，“方志”在其中却出现两次，可见左思观念中的“方志”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参考资料。该文写成之后被广泛传抄，引发“洛阳纸贵”现象，可以说明“方志”这一词汇在当时的士族阶层中存在一定的认识度。《晋书·左思传》并无左思游历蜀地成都、吴地建业（今南京）的记载，他创作《三都赋》可能主要是依靠在秘书郎职务上所接触的地方典籍（秘书郎中为三国魏文帝黄初年间设置的典籍管理官员）。可以揣测，此时所认同的“方志”，有可能是朝廷机构秘书署需要收藏的地方资料之一。

（二）《水经注》中的方志观念

《水经注》言及方志两次。其一为“汝水”条，“余以永平中蒙除鲁阳太守，会上台下列山川图，以方志参差，遂令寻其源流。”^③酈道元在鲁阳任职，恰逢上司要求展示山川图，因方志记载不一，所以他下令探寻汝水源流。此处所述“方



《水经注》扉页

志参差”，是前文引用的《地理志》和《博物志》对汝水的源头说法不一致。其二为“沙水”条，“因其方志所叙，就记缠络焉。”^④此处所称“方志所叙”，是前文中引用的《陈留风俗传》以及京相璠的作品对“澹台子羽冢”的方位说法不一致，酈道元难以分辨，“未知孰是”，就记下两种方志中矛盾的说法。京相璠，生平事迹不详，西晋裴秀司空府门客，曾参与编绘《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并独立编纂有《春秋土地名》，京相璠目前有载的两种作品均属地理类。可以确证，在酈道元的观念中，《陈留风俗传》之类的地记，以及其他的一些地理作品，均属于方志。

①南朝梁萧统：《六臣注文选》卷第四《三都赋序》，四部丛刊景宋本，第16页。

②南朝梁萧统：《六臣注文选》卷第五《吴都赋》，四部丛刊景宋本，第9页。

③北魏酈道元注释，明代朱谋埠笺：《水经注笺》卷二十一，万历四十三年刊本，第1页。

④北魏酈道元注释，明代朱谋埠笺：《水经注笺》卷二十二，万历四十三年刊本，第34页。

⑤南朝宋范晔撰，唐代李贤注：《后汉书》卷一百十八，万历三十四年北京国子监刻本，第21页。

（三）《后汉书》《魏书》中的方志观念

《后汉书·西域传》在评论西域风土时，言及方志一次。“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⑤身(yu ā n)毒，即古人对印度次大陆上文明区域的音译称呼。在《后汉书》编修者的观念中，两汉时期，已经有了方志作品。但可能由于作品较少或记载不全面，“二汉方志”对于佛教起源于印度的事情并无记载。

此外，还有《魏书》言及方志一次，“沙海荒忽之外，瀚漠羈縻之表，方志所不传，荒经所不缀，莫不绳谷钓山，依风托水，共仰中国之圣，同欣大道之行。唯夫三吴、百越独阻声教，匪民之咎，责有由焉。”^①这一篇《岛夷萧衍》列传，是南北朝百年对峙的一个表征。北朝自认为是中国正统，称呼南朝君主为岛夷，说沙漠戈壁之外，连方志和荒经都没有记载的地方，（那里的人）登山渡谷，前来敬仰中国的圣人。只有三吴、百越之地不服王化。在《魏书》编修者的观念中，方志的记述范围已经涵盖了大部分域内、域外之地，只有极度偏远的地方才没有方志记载，是一种普遍的地理文化现象。

（四）小结

通过这些官私性质的文献可以明确，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初步诞生了“方

志”的观念，魏晋士大夫已经明确将某类文献称呼为“方志”，其中就包含地记。这部分研究，已有学者提出过类似观点。陈桥驿认为，“方志之名及学者有意识的撰写方志，应该认为是从六朝开始的。”^②韩章训认为，“约自南北朝始，随着历史独立为学和史书独立为类，作为方志观念的笔事说则开始萌芽。”^③本研究只是更加详细地征引当时流传下来的各类文献，对方志观念萌芽阶段加以充分说明。魏晋时期所认为的“方志”，不完全以“志”为名，可能体例也与今日认定的方志相差甚远，其中记载的内容包括山川、墓冢、鸟兽、草木、风俗等，但这些内容不一定合于一书。此时的部分“方志”已经是地方当政者和文学创作者掌握一地地理情况的重要参考。由于文献佚失难征，持有方志观念的士人数量的多寡，不得而知。

三、隋唐时期方志观念共识的成熟

到隋唐时期，各类文献中关于“方志”二字的记载则屡见不鲜了，在对“方志”的认识上，还出现了一些意见相左的观点。从存世文献上来看，相较于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文人对所称方志的认识是更进一步的，大量涉及到了方志的功用。这一时期，还可见到不少典籍引用《周礼》中关于方志的记载，如《隋书·经籍志》《通典》等。虽然目前未找到隋

①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九十八·列传八十六，崇祯十七年毛氏汲古阁刻本，第15页。

②陈桥驿：《图经在我国方志史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2期。

③韩章训：《论方志观念的嬗变》，《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7期。

④东汉班固撰，唐代颜师古注：《前汉书》卷二十八上，万历三十四年北京国子监刻本，第11页。

代关于方志的直接记载，但由于隋代维系大一统时间较短，传世作品较少，很多初唐人才的成才、成长均在隋代，因此这部分还是以隋唐并列论。此阶段文献较多，按时间先后大致顺序进行详述。

（一）颜师古的方志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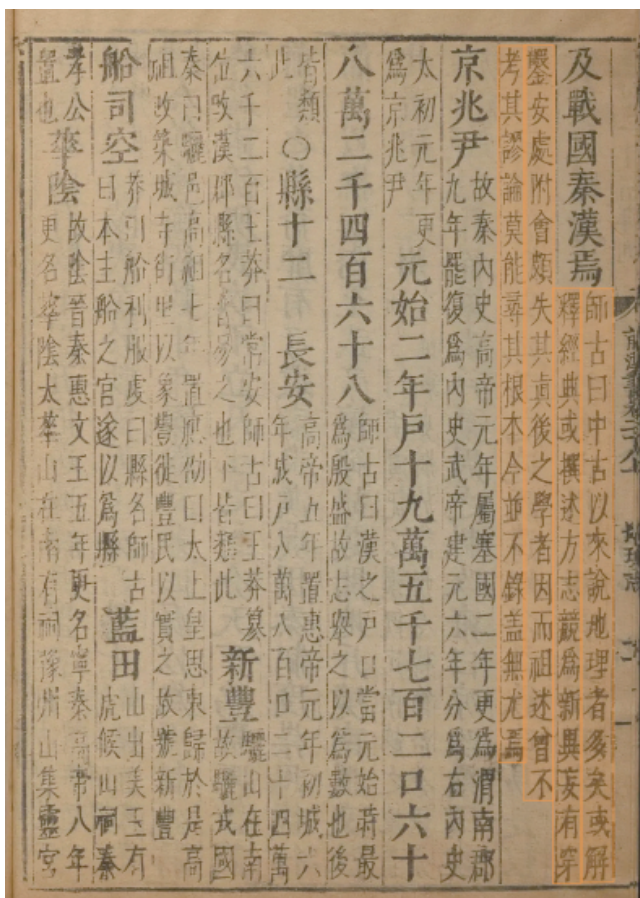
隋唐时期，关于方志的最有名记载，莫过于颜师古对《汉书·地理志》所作注释，“师古曰：中古以来，说地理者

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今并不录，盖无尤焉。”^④颜师古认同方志属于地理类的文献，且“中古”以来地理著作很多，但颜师古对这类包含方志在内的地理文献评价不高，认为其标新立异、穿凿附会，造成了地理真像的消失。所以颜注释《汉书》，

对此类文献一概不用。在颜师古的观念里，前人和时人撰述的“方志”，还远不能起到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功能。“今并不录，盖无尤焉”的注史方式是否正确，这里不作讨论。结合《水经注》的两处记载来看，颜师古所能见到的“方志”虽多，定然是存在突出的泥沙俱下、众说纷纭的问题。

（二）《大唐西域记》和《释迦方志》中的方志观念

初唐时期，对于“方志”二字记载较多的还有《大唐西域记》，分三处。其一在敬播所作序言，“窃以穹仪方载之广，盖识怀灵之异，谈天无以究其极，括地讵足辩其原？是知方志所未传，声教所不暨者，岂可胜道哉！”^①敬播（？—663），初唐官员。他在序言开篇就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释

①唐代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序，高丽藏本，第1页。
 ②宋代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四十《睦亲族》，四库全书本，第13页。
 ③戴思哲著，向静译：《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第52页。

称,宇宙广阔,万物繁复,《谈天》和《括地》两书也完全不足以说清世界万灵的边界、原委。方志没有记载,教化没有到达的地方,根本说不尽。这相较于《魏书》的世界观、地理观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说明在这一时期的地理探索和“方志”著作影响下,唐代士人清醒认识到,大唐之外,仍有广阔天地。序言中所说《谈天》可能是天官书、天文志之属,所说《括地》,按时代来推测应该是李泰主修的《括地志》。宋代汇编的《唐大诏令集》收录有《魏王泰上括地志赐物诏》,记载唐太宗诏令赞誉其书,“博采方志,得之于旧闻”,并且声称“地记之设,由来尚矣……汉志、晋图,各有所纪”^②。在敬播的观念中,《括地志》这类地理总志,也属于方志。而且,将“方志所未传”和“声教不暨”并列,揣摩其意,“方志”和“声教”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即认为方志是汉文化传播的一个标志,接受汉化的地域大多数都应当有方志记载。正如戴思哲所说,“地方志是在汉语语境下讨论华夷问题的重要文献。”^③所以,初唐之际,“方志”已逐渐演变为士族阶层中对地域文化认同建构过程的华夷之辨一项标志。

其二在卷一的玄奘自序,他阐述佛教的世界观,宣扬娑婆世界的大海中有

四洲,四洲之一的赡部洲,地有四主,南象主、西宝主、北马主、东人主。论及四主的山川风俗差异时,点到方志。“若其山川物产之异,风俗性类之差,则人主之地,国史详焉;马主之俗,宝主之乡,史诰备载,可略言矣。至于象主之国,前古未详,或书地多暑湿,或载俗好仁慈,颇存方志,莫能详举。”人主之地,山川风俗资料的记载连续性很强,“国史详焉”。马主之俗,宝主之乡则相对差一点,但仍然“可略言”。象主之国,前古之事不详,但(近古)“颇存方志,莫能详举。”^①。在玄奘的观念中,国史、诰书、方志这些文献都具有存史的功能,但是在作用的价效上,他认为国史大于方志。

其三在全书末尾辩机所作记载,他谦虚表示,“负燕雀之资,厕鹓鸿之末。爰命庸才,僭斯方志。”^②只是幸运成为玄奘法师的弟子,我这个庸才才被任命来撰写《大唐西域记》这部方志。辩机在后文中还写道,“恭承志记,论次其文”“庶斯地志,补阙山经。颁左史之书事,备职方之遍举。”在辩机的观念中,《大唐西域记》这部以“记”为名,记述域外情况的文献,是方志、志记、地志,即他认为方志、地记、地志是同一类事物,而且认为方志是左史和职方的职责之一,

①唐代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卷第一,高丽藏本,第4页。

②唐代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卷第十二,高丽藏本,第17页。

③南朝梁萧统:《六臣注文选》卷第五《吴都赋》,四部丛刊景宋本,第9页。

④清代董诰:《全唐文》卷零四百四《邵润之》,嘉庆十九年武英殿刊本,第18页。

既属于史，也属于地理。

玄奘翻译佛经时的得力助手道宣，曾创作有《释迦方志》。该书成于永徽元年（650），是记述释迦牟尼诞生地和佛教流布地的佛教典籍。目前，尚有高丽藏本、福州藏本、普宁藏本、思溪藏本等多个版本存世。这部书直接以“方志”为名，可见是模仿“方志”而作，分为封疆、统摄、中边、遗迹、游履、通局、时住、教相等八篇。游履篇记西汉至唐，沙门十六次出游西域的事迹。通局篇记西周至南朝陈，佛教入华的各种传说和感应故事。教相篇记西晋至隋代，历代皇帝的奉佛事迹。游履、通局、教相都是明显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事物的发展。这部被当时的人命名为“方志”的作品，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方志编纂观念。

（三）张铎、邵润之、萧颖士、独孤及、吴筠等人的方志观念

张铎（生卒年不详），唐代官员。开元（713—741）时期，吕延济、刘良、张铎、吕向、李周翰对萧统《昭明文选》进行合注，时谓《五臣注文选》。张铎为前文所说的《吴都赋》的“方志所辨”一句作注，“方志谓四方物土所记录者，若分辨色类，则必有中国之所叹羨也。”^③《文苑英华》中录有一篇《对伏日出何

典宪判》，为开元二年（714）进士邵润之参加书判拔萃科的答题。考题大意是，广汉等四郡因气候与中土不同而自择伏日，地方性的风俗与长安的政令有了冲突，当如何处理。对于自择伏日的现象，邵润之虽然持否定的态度，但他的对答中也提到广汉四郡特殊情况，“按方志之所宜，或殊寒暑。”^④

孙逖（696—761），唐代官员。开元时期，孙逖创作的赠别散文《送裴参军充大税使序》通过送别场景记述其主持税务的政务筹备与行程规划。文中提到会稽郡物产丰饶，“故女有余布，而农有余粟，以方志之所宜，供天府之博敛。”即地方官员按照方志的记载，来选取进贡的物品，这无疑认为是方志有《禹贡》类地理文献的作用。

萧颖士（717—759），唐代文人。他曾代从叔萧谅起草《为从叔鸿胪少卿论早请掩骼埋胔表》，上表唐玄宗。表中提到，治理国家应该“礼其大统”“推其至理”，就能通晓阴阳运行的规律、洞察时势变化的端倪，“诚细有所遗，备诸方志，昭然可辨。”^①他认为方志具有政书的属性，能够补充和验证治理决策的细节。

独孤及（725—777），唐代官员、散文家。独孤及《慧山寺新泉记》记载，“此

①唐代萧颖士：《萧茂挺文集》，四库全书本，第23页。

②唐代独孤及：《毗陵集》卷第十七《慧山寺新泉记》，四部丛刊景清赵氏亦有生斋本，第14页。

③唐代吴筠：《宗玄先生文集》卷上《竹赋》，正统道藏本，第3页。

④清代董诰：《全唐文》卷五百十三《于公异》，嘉庆十九年武英殿刊本，第24页。

⑤唐代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第三《律诗》，四部丛刊景宋本，第5页。

寺居吴西神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凭而上。山下灵池异花，载在方志。”^②

吴筠(?—778)，唐代道士，死后弟子私谥其为“宗玄先生”。吴筠《竹赋》谈到竹子有很多种类，转而又称，“方志之所遗载，山经之所阙书者，安可得而详矣。”^③与上文《大唐西域记·记赞》一般，在前后句中同时提到方志和山经。

兴元元年(784)，殿中侍御史于公异奉中书令、西平郡王李晟之命，作《吴岳祠堂记》，于吴山(位于今陕西陈仓)立碑。祭文中称，“山之广袤，载于方志，略而不述。”^④

以上这些作者事迹都难以详细考证，记载也较为零散，只能从流传的文字推测，盛唐、中唐时期所认为的“方志”，其记载包含山川、名胜、物产、草木、气候方面的内容，可以印证此时持有方志观念的人员数量及阶层，已大为增长。

(四) 刘禹锡、权德舆、司空图、李商隐、崔致远等人的方志观念

永贞元年(805)，刘禹锡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时，在《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序》中自述“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员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至则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⑤他到朗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方志

的记载，向当地人验证是否属实，然后察阅当地的山水风物，发现确实是如同之前的诗人所描写的一般。

过去论及地方官员崇志的案例，以昌黎先生和紫阳先生的事迹提及较多。韩愈过南岭将至韶州，先写诗寄刺史借图经；朱熹知南康军，下轿先问当地图经。例如黎锦熙在《方志今议》的“次广四用”节，“旅游指导”目，就提到这两个案例^①。原文说朱熹问《南康军志》，查阅大量文献目录资料，并无《南康军志》一书。结合《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录的《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稟事件状》等文章，以及诗歌《入南康界阅图经感陶公李渤刘凝之事戏作》的记载来看，确认是图经无疑，所谓“下轿伊始问志书”，是后人将图经加工为志书。

结合上述两个典故，并按照已知的唐代书目分析，刘禹锡在朗州查阅的方志很有可能也是以图经为主。《玉函山房辑佚书》《麓山精舍丛书》等文献辑佚的唐代方志中，就有《朗州图经》，但并无朗州志或朗州地志。在刘禹锡的观念中，很有可能认为图经就是方志。同时，说明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已经认识到了方志具有旅游指导的作用。

元和十二年(817)，韦乾度在朗州任职时，在《桃源观石坛记》也提到“验

①黎锦熙、甘云鹏：《方志学两种》，岳麓出版社，1984年1月，第24页。

②清代董诰：《全唐文》卷七百二十四《韦乾度》，嘉庆十九年武英殿刊本，第12页。

③唐代权德舆撰，民国姜殿扬校补：《权载之文集》卷第四十三《表》，四部丛刊景清嘉庆本，第9页。

④唐代权德舆撰，民国姜殿扬校补：《权载之文集》卷第二十二《墓志铭》，四部丛刊景清嘉庆本，第2页。

方志，秦人获天爵之所；稽近圣，元宗皇帝树火枣之乡。”^②文中提到武陵郡（原文误作“铜陵郡”）的自然风光，有“深流有沅湘七泽”之句，岑仲勉已在《读全唐文札记》中对此文进行过考证，唐世无铜陵郡之称，断定此桃源即今湖南桃源县。这两个朗州任职官员的案例说明，唐代地方官员到任以后，翻阅方志已经是较为常见的现象。

权德舆（759—818），唐代宰相。贞元十四年（798），他兼任知制诰时，曾经代宰相贾耽起草《贾相公谢赐马及银器锦彩等表》，表中以贾耽的口吻陈述，“臣以末学，获奉昌期，尝好地理之书，颇知河湟之事。明征史事，博考前闻，夙夜以思，岁时遂久。纪诸文字，绩以丹青，上尘圣聪，庶备方志。岂谓眷慈宏奖，宠赉特深，出珍华于内府，下驹骏于天廄。”^③。贾耽向唐德宗进献关内陇右图并录十卷，德宗则对其进行了赏赐。这一份表达感谢的奏表中，贾耽自谦末学，说只是恰逢盛世，自己又曾经好学地理，对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的事情比较了解，所以把这个地区的情况用文字记载下来，呈递给圣人，希望能作为方志保存，没想到圣上赏赐如此隆厚。按照一般办事流程推论，权德舆代拟的

这份表奏也需要送贾耽审定。这说明，“方志”一词，在晚唐时期的官方中已成为清晰的概念。

永贞元年（805），在贾耽病逝后，权德舆为其撰写了墓志，盛赞贾耽“博闻强识，通天下之志”，而且提到了贾耽在编修方志方面的功绩，“撰海内华夷图及论次地理之书，凡五十有五编，贡在中禁，傅于域内，言方志者，以公名家。”^④他认为贾耽是名副其实的方志名家。《旧唐书·列传第八十八》保留了贾耽两篇表的原文，正对应贾耽两次敬献地理文献。奏表中称，“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谨撰《别录》六卷”“研寻史牒，……编为四卷”，以及“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⑤。从《旧唐书》文字记载推断，贾耽进献的关内陇右图并录十卷、《海内华夷图》及论次地理之书，既有图又有记载，图在文前，形式上定然和图经类似。在权德舆的观念中，这类图经即方志。

权德舆另一篇《杜公淮南遗爱碑铭并序》，赞扬杜佑（累官至同平章事、司徒）治理地方的良政，也提到了方志，“扬美化于方志，流淑声于命书。”^⑥可见，此时的方志也会记载官宦政绩。且中晚

①五代刘昫撰，清代沈德潜考证：《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四库全书本，第15页。

②唐代权德舆撰，民国姜殿扬校补：《权载之文集》卷第十一《碑》，四部丛刊景清嘉庆本，第3页。

③唐代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第四《杂著》，四部丛刊景旧钞本，第6页。

④唐代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第四《杂著》，四部丛刊景旧钞本，第5页。

⑤清代董诰：《全唐文》卷七百七十六李商隐六《为荣阳公上浙西郑尚书启》，嘉庆十九年武英殿刊本，第13页。

唐时期，帝王以及宰相、三公之类的高官多通晓方志、重视方志，所以，权德舆才会在上述遗爱碑铭开篇感叹，“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感会而已”。

司空图（837—908），晚唐官员、诗人。中年以后，司空图归隐河中（今山西运城）。他创作的散文《说鱼》记载，“蒲之东七十里，山秀而瘠，故其水迅激，不能蓄鳍介之族，著于方志焉。”^③即说明当时的方志，记载了蒲地某山，山中水不能养鱼的情况。

司空图创作的另一篇散文《华夷图》，记载了尚书右仆射贾耽的方志作品《海内华夷图》，“煨烬所残，尚存贾仆射耽方域之志，披图校验，成败可知。”^④结合《说鱼》散文可知，司空图所称方域之志，即方志。在司空图观念中，也认同《海内华夷图》属于方志，并且认为“方域之志”还具有战略决策和分析的作用。

大中元年（847），李商隐曾代桂管观察使郑亚为浙西观察使郑处海致信，“此方且多杂俗，又异奥区，但余江山，记在方志。”^⑤信中称，（桂林）这里不仅习俗复杂，而且不同于大唐腹心地区，只剩下自然风光被记载在方志中。在李商隐的观念中，方志这一文化现象是从中原向边疆辐射的，中原方志记载的内容比较丰富，边疆方志则相对简略一些。

这和敬播的方志观念有相似之处。

崔致远（857—？），朝鲜半岛人。少年时西渡入唐。乾符元年（874）进士及第，曾在唐朝为官，留唐十六年，是新罗留学生中官职最高的一位。在担任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府官期间，他曾见到吴降（安南柔远军从事）集录的《安南录异图》，并为之作记。文中开篇就说越南疆界的图经很详细，“交趾四封，图经详矣。然而管多生獠，境迩诸蕃。略采俚谭，用摽方志。”^①但是辖内很多山民，境内很多部族。所以简略集乡野传说，用来彰显（摽，通“标”，标榜彰显之意）这部方志。在崔致远的观念中，图经即方志，《安南录异图》也属于方志，只是这部图经（方志）不同于以往，采信了一些民间通俗观点。同时也证明，隋唐时期随着汉文化的传播，方志观念已经逐渐外溢到新罗、安南这些中华文化圈附属国。

晚唐时期，官员张鹭曾撰文《仙都山铭》。仙都山在今浙江缙云县，推测此文或为张鹭在开成年间（836—840）任职淮南节度副使时所作。该文描述仙都山美景，并称黄帝炼丹和乘龙升天的事迹列载于当地的方志，“丹灶犹存，龙升万里。事列方志，道高青史。”^②说明此时认为的方志，也会记载地方传说。

杜光庭（850—933），唐末五代时

①唐代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卷之十六祭文书疏记十首《补安南录异图记》，四部丛刊景高丽本，第8页。

②宋代姚铉编：《唐文粹》唐文粹卷六十六，四库全书本，第11页。

③清代董诰辑：《全唐文》卷九百三十二《青城山记》，嘉庆十九年武英殿刊本，第12页。

期道士。他的《青城山记》云，神州之内众多名山，名山之上，“有神仙洞室，福地灵墟，显于仙经，载于方志。”^③虽然涉及道教，此处方志的“方”，不能排除是“方外”之意，但这篇文章中也引述了《十三郡记》《华阳国志》《益州记》《地理志》等地记、地志作品，该处所说方志，更多可能是指代这些文献。

（五）小结

上述征引的部分文章，在《文苑英华》《唐文粹》《全唐文》等书中也有收录，可为佐证版本。通过这一时期的诸多文献记载足以证实，隋唐时期，方志观念已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涉及阶层广泛，并诞生了种种对方志的性质、作用、功能的认识，与今天对方志的相关研究有类似之处。同时也可以看到，隋唐时期很多文士，既有人认同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地记、地志是方志，也有人认同这一时期图经和方志是同一观念的文献，甚至于全国性的地理总志，也有人认为是方志。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所认为的“方志”，如《释迦方志》，虽然已经出现了“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方志编纂原则，与现今意义上而言的方志可能在框架内容上依然存在着重大差别。但无论如何，隋唐时期的中央和地方官员，既重视编纂方志，也重视使用方志，到中晚唐时期，这一现象到达了高峰。在这一过程中，方志观念随汉文化传播影响新罗、安南等周边地区，奠

定了后世方志的基本概念框架。

四、总结

魏晋至隋唐时期，左思、酈道元、刘禹锡、李商隐等文学翘楚，范晔、颜师古等史学大家，玄奘、道宣等哲学宗师，诸多文史哲领域的先贤，以及儒释道三家，均在作品中体现了对方志这一类文献的理解。这些记载充分印证了方志文化的弦歌不绝与方志形制的丰富多元，其观念传承与编纂实践跨越两千年时空，虽历经朝代更迭与学术思潮变迁，却始终绵延不绝。诸如地记、地志、图经等方志称谓的演变，只是这一文化脉络的生动见证，而非现代学者的标新立异。需特别说明的是，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因古人作伪、学术观念差异、传抄刻印讹误等因素，其真实性需要审慎考辨。例如《全唐文》的文献整理，就曾受到劳格、岑仲勉、陈尚君等学者的指正。受限于个人学识积累与研究时间不足，本文在文献引用时虽力求广泛以避免孤证，但未能对每条史料进行系统的真伪考订，这成为本研究的一个学术遗憾。期待后续研究能够在此基础上，通过更深入的文献考证与学术梳理，使方志观念的研究日臻完善。

（作者单位：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
湖南省地方文献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伟

固若金汤重庆城

李正权

城的出现，是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大约5000年前，中国就出现了城。历史上中国曾修筑过多少城，现已无法统计。如今保留下来的也相当多，有的比重庆城还保留得更完整。成都号称十大古都之一，如今也保留着一些古城城墙和遗址。但为什么重庆古城墙能够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而成都古城墙却没有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重庆城有许多独特之处，非其他古城所能比。

城从土，从刀，从戈，是古代的一种军事设施或军事建筑，主要用于防卫。城的位置、大小，城墙的高低、厚薄，城门的设置、格局，都着眼于防卫，包括以攻为守的防卫。防卫能力强，控制领域广，就是“好”城。从控制领域来说，重庆城地处长江嘉陵江汇合处，不仅能够控制原来的整个川东地区（包括现在的重庆市和川东北和川南部分区域），而且因地处长江上游，对长江中下游也形成了居高临下之势。事实上，从“王

濬楼船下益州”以后，占据重庆，然后顺江而下攻取长江中下游，就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选择。元蒙铁骑在四川肆虐几十年，全靠以重庆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顽强抵抗，南宋才得以苟延残喘。彭大雅所筑的重庆城，在抗击元蒙进攻中立下了大功。在明末清初那几十年的战乱中，重庆城虽然几经易手，杨应龙、奢崇明、张献忠、吴三桂以及明军、清军都曾占据过或意图占据重庆城，有的还是反复占据。但是，除了张献忠是通过强攻通远门而入之外，其他几乎没有攻打过重庆城，或者都没有攻破过重庆城。即使是热兵器时代，民国初年军阀混战，重庆成为各方争夺重点，周边的铜元局、佛图关、二郎关、铁山坪、寸滩等地都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但也并没有发生过直接攻打重庆城的战斗。当年解放军进入重庆城，也没有发一枪一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重庆城的防卫能力相当强，比那些深壕高城都要强得多。

重庆是一座山城

从防卫能力来看，重庆城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这是一座独特的山城上。不管是冷兵器时代还是热兵器时代，高地都是防御的优势位置。利用险峻的山势筑城，不仅可以获得防御的优势，也可以获得反击或反攻的优势。因此，中国也好，外国也好，历史上都曾筑有很多山城，至今仍然被俗称或别称为山城的城市也不少。但是，这些山城的相当大一部分，或者是建在高原上的，那高地相对平坦，城里也是平坦的；或者是建在山间里的，城里基本上没有大的起伏；或者仅仅是依山而建，后来由于城市发展才逐渐扩展到山上。有人把香港称为山城，但香港原来只是渔村，是没有城的。因为地

处两山之间，有人把兰州也称为山城，但兰州古城却是建在黄河边的平地上。贵阳是与重庆相仿的山城，但贵阳古城里并没有山。重庆城独特之处在于，城在山上，山在城中。与重庆城真正相仿的，可能只有涪陵、万州、泸州等处。即使这些比重庆城规模小得多的城，也只能与重庆城隔着嘉陵江相对的江北城相似，城里也只有坡而没有山，可以称其为“坡城”，不能与重庆这样的“山城”相比。像重庆这种把城与山完全融为一体的山城，在中外古城中可能还很难找到。因此，至少是在中国，“山城”二字几乎成了重庆的专用代名词（别称）。

重庆是一座险城

由于是山城，重庆城的城墙大多修

在悬崖峭壁或陡坡上，其走向大体呈一个等腰三角形，两条腰都临江。临江之岸几乎都是悬崖峭壁或陡坡，大多都有二三十米，高的竟然可达七八十米。即使不临江，城墙往往也修建在悬崖峭壁上，没有一段城墙是完全建在平地上的。城墙建在悬崖



清代重庆城地图

峭壁或陡坡上，城墙虽不高大，但悬崖峭壁或陡坡构成了城墙的一部分。如果把悬崖峭壁或陡坡的高度计算在内，可能还没有哪一座古城有这样高大的城墙。而且，相当多的悬崖峭壁下还有深浅不一的岩厦（重庆人称其为“凹岩岩”），更增加了攀爬的难度。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武器和装备如床弩、抛石机、冲车、云梯之类，在重庆这样的城墙城门前基本上失去作用。要从这样的悬崖峭壁下攻破悬崖峭壁上的城墙城门，几乎没有可能。事实上，重庆历史上就很少出现过攻打悬崖峭壁上城墙城门的战例。当年，元军凭借一时的鲁莽，曾经攻打过重庆的几座城门，但均以失败告终。张献忠攻打重庆时，曾经攻打过南纪门。相对于其他城门，南纪门前的陡坡相对较低，相对较缓，但张献忠才打了一下就明白了，那是打不下来的，于是立即转而攻打通远门。只是守城明军太缺乏斗志，重庆城才被张献忠打了下来。

城建在山上，守城的最大风险是水源。《三国演义》中，马谡守街亭，将营盘扎在山上，魏军断其水源，蜀军就不战自乱。

据《合州志》《无名氏记》记载，在宋蒙的钓鱼城之战中，有人曾命人从钓鱼城里的大天池中“取鱼二尾，重三十斤，蒸面饼数百”送到蒙古军中，说：“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于是蒙军只好撤兵。钓鱼城虽在山上，城中虽然有水池，但城里相对平坦，面积狭小，城里不可能长期养鱼，这样的记载可能只是传说而已。重庆城比钓鱼城大好几倍不说，城里还有山。当年城里人口不多，山上还有原始森林，水源相对充足，也就可以避免马谡失街亭之误。而且在冷兵器时代，守城的主要武器是石头，重庆城内有的是石头，几乎不存在弹尽之虞。

重庆城墙大多不是“墙”而是“壁”

由于城墙大多修在悬崖峭壁或陡坡



洪崖洞上的城墙

上，重庆城的大多数城墙不是“墙”而是“壁”，可以称其为“城壁”。由于城墙不是建在悬崖峭壁上就是建在陡坡上，往往只在城外一面垒起一定高度的堡坎，堡坎上再修建大半人高左右的垛墙（实际上起着栏杆的作用），城里一面则与街道齐平或基本齐平。这样，不仅大大降低了筑城的工程量，而且也增大了城墙的“厚度”，城墙与山体往往连成一体，其“厚度”就是整个山的“厚度”了。一些地方即使有填土层，也只填了一部分，填土层的厚度和深度都有限。而且，据考察，相当多的地方还是填的红页岩或碎石。这样的城墙，即使用大炮轰，用炸药炸，往往也很难轰垮炸塌。同时，城里人要上城墙，不必爬坡上坎，交通更方便。即使敌方攻上城墙，城里人往往还能居高临下，很容易进行支援，将其赶出城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不少城市都拆除城墙，将拆除后的城墙地基作为公路使用。重庆也拆除了部分城门，但却因城墙大多是“壁”不是“墙”，不需要拆除或者不存在拆除的问题。有的地方，因为城墙外有堡坎，城墙上又比较平顺，因而就直接用来作公路了，其典型就是朝天门到千厮门现在称为朝千路的那段公路。民间流传的《重庆城门歌》就有“西水门，跑溜马，快若腾云”。西水门是朝天门与千厮门之间的闭门，因那段城墙直而平顺，很早就是“马路”

（马跑的路）了，改建成公路也相当方便。正因为这样，重庆城就保留了相当大一部分城墙，至今我们还能在很多悬崖峭壁或陡坡上找到这样的城墙遗址。

重庆是一座石城

历史上最早修筑的城，几乎都是土城，城墙都是就近取土夯制而成的。后来，才用砖敷设土城两侧的外立面和顶面，形成砖城。到明清时才改变工艺，边砌砖边筑土。这样的城墙，抗击大炮轰击或炸药爆炸的能力相当有限，因而才有挖地道用炸药炸垮城墙的战术和战例。重庆城的地层主要为泥岩和砂岩，只有少量的堆积层、冲积层、崩积层泥土，而且主要分布在两江沿岸和悬崖之下，缺乏筑城的泥土，要找大量的石头却很容易。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民间采矿冶炼的管制，北宋时的钢铁产量就有了极大的提升。有人根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对宋代不同时期钢铁“岁额”进行统计，估算出年产量约为2万吨。^①加上南北朝时期就发明的灌钢技术已经逐渐成熟，钢的性能已经有了极大提高，开山采石已经相当普遍。彭大雅和戴鼎筑重庆城时，已经没有重大技术障碍，他们不可能舍易就难，舍石头而寻泥土，修建石城也就顺理成章。重庆城在山上，到处都可以采制石材。

^①见《快资讯·深夜读史计》

即使城里或城边的石材不够，也可以在城的附近采石，可以通过长江嘉陵江将石材运到筑城工地。

重庆城的城墙（城壁）城门大都是用长近一米、宽和高约二十二三厘米的条石修筑的。为了加固城墙，条石往往采取与城墙走向垂直的方式砌成。即使是通远门附近那两百多米长的城墙，是真正的“墙”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壁”，依然也是用这样的石头砌成的。那城墙里的填充物也不是泥土，而是土石混合物，石渣占了相当大的部分。这样的石城城墙城门，古时的大炮是很难轰垮的。传说张献忠攻打通远门，是挖地道到城墙脚，然后用棺材装上炸药，轰垮了城墙。其实，通远门城外是一夹谷，土层不厚，而且城墙外又是一个陡坡。如今我们都可以看到，那城墙是直接修筑在岩石上的，是不可能从岩石中间挖什么地道的，更不可能“多穿地道”。史书上的关于“以火药轰城，立溃”^①的记载，笔者认为并不可信。通远门附近的城墙厚达十米多，填充物又主要是石渣。当年没有TNT炸药，即使挖了地道，即使用上两三百斤黑色火药，也是不可能“立溃”的，不可能轻轻松松就炸垮。通远门建在一个山岗上，城墙直接落在岩石上，要从山岗底部挖地道，用什么去挖？未必张献忠有盾构机（隧道掘进机）？因此，“以

火药轰城，立溃”的记载是不可信的。吴伟业是江苏太仓人，并没有到过重庆。这样写，或许是作者不了解重庆城的实际情况而臆测，或许是为后来被张献忠砍掉脑壳的主战巡抚陈士奇开脱。

重庆是一座江城

重庆是山城又是江城，长江嘉陵江左右环绕，起到了天然护城河的作用。要攻打临江的城门城墙，就必须克服江水的阻扰。洪水季节，江水往往淹到城墙下，但由于悬崖峭壁或陡坡的作用，即使海拔较低的一些城墙城门，与江面的相对高度依然达二三十米，古代的楼船是难以高过城墙的。而且，洪水季节，江流湍急，要固定战船十分困难。战船不能固定，江岸又变得十分狭窄，攻打就更不可能进行。枯水月份，除朝天门与东水门城外之间以及南纪门城外有沙滩外，其他地方依然是陡峭的坡地，不能聚集大量兵力。城里守方一旦反击，攻方就扎不住阵脚。在沙滩上聚集兵力，在遭受攻击时因要背水而战而成为兵家大忌，一般来说不大可能采用。历史上，元军曾经从临江的城门多次攻打重庆，但都以失败告终。元军作战，靠的是铁骑冲击，对在重庆这样的山地作战并不擅长，往往只能凭一时之勇，乱打一气，

^①清代吴伟业：《绥寇纪略》，民国《巴县志》卷十二一下，见《重庆地域历史文献选编》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15页。下同。

以气势吓倒对方，哪知却在重庆城下碰了钉子。南明隆武二年（1646）冬，张献忠余部刘文秀曾攻打过朝天门。据说刘文秀亲率勇士，口衔利刃，不怕隆冬寒流，从江北跃入嘉陵江，趁朝天门明军战船不备，砍断铁缆，杀得明军措手不及。大西军乘机冲杀，从朝天门杀入城内。这个例证即使是真实的，也只能说明明将曾英打了几次胜仗后太骄傲了，太放松了，竟然被几千人打了个措手不及，那样高的悬崖峭壁，那样高的城墙竟然也被攻破！

重庆是一座龟城

城在江边，城又建在山上，城墙顺着山势蜿蜒，重庆城的平面就不规则。平原上筑城，可以按筑城者的意愿，或方或圆，重庆就不行。事实上，中国古代之城，大多为正方形，坐北朝南，在正方形的四条边上分别设城门，大多设有四门。北京城本系正方形，后又在其南边再筑一座长方形的外城，呈“凸”字形，共设十六座城门（包括两座便门）。即使像江北城、万州城之类“坡城”，其平面图依然可以成形，或成椭圆，或成不规则的多边形。重庆城的城墙弯弯曲曲，有多处凸出，又有多处凹进，完全视山势而定，很不规则。虽然如此，从天上看，却大体上像一个乌龟，因而称为龟城。“龟”之头在朝天门外两江汇合处的沙嘴，“龟”的尾巴在城西打

枪坝外，加上重庆城中的山梁（古称金碧山即今新华路）成为脊背，这“龟”就有些活灵活现了。古代，龟与麒麟、凤凰和龙一起谓之四灵，龟又是仁寿的象征，可以辟邪挡煞、消灾避害、镇宅纳财，被称为龟城，也是重庆人的一种福气吧。

重庆城门多而密

重庆城有十七座城门，九开八闭，被人说成是九宫八卦，甚至说当年筑城就是按九宫八卦规划的，这当然是牵强附会。重庆城的城门之多，除了北京、南京那样的都城，在全国古城中可谓首屈一指。重庆城平均400多米就有一座城门，相距最近的城门甚至不足150米，这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之所以有这么多城门，可能是重庆的地形地貌决定的。首先，重庆是山城。城墙弯弯曲曲，高低不平，城门之间沟通困难。一旦有战事，城门之间相互支援就会受到很大限制。城墙往往是光秃秃的，囤兵囤粮囤兵器，往往只能围在城门里或城楼上，因而就要多建城门。其次，重庆城是石城，大多数城墙又只是“壁”而不是墙，修城门相对容易，特别是修闭门几乎增加不了多少工程量，多设城门还能够给重庆城增加景观，于是就形成了城门多而密的格局。从积极防御的角度看，城门多也有其好处。北宋抗金名将陈规曾在《守城机要》

中说：“城门贵多不贵少，贵开不贵闭。”^①

重庆城有特别的闭门

重庆有十七座城门，其中八座都是闭门。所谓闭门，就是只有城楼没有城门的“门”，或者有城门的样子却被堵塞死了的“门”，不能进也不能出，主要用于军事，也用于排水。闭门虽然被称为“门”，但那城门却是打不开的，与城墙一样坚固，甚至比城墙更坚固。其他古城可能也有闭门，但那闭门却是有“门”的，只是将门暂时堵塞了，或者是城门一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打开过。如果需要，这样的闭门是可以立即打开的。重庆的闭门实际上只有城门的样儿，是没有“门”的。重庆多暴雨，排水是一个大问题，大多数闭门都具有排水功能。例如从大梁子（现新华路）经正阳街、大阳沟到洪崖洞，原来有一条溪沟，并且在洪崖洞前形成古代巴渝十二景的“洪崖滴翠”，而洪崖门（闭门）就建在洪崖洞上。又例如现在的潘家沟、上下回水沟原来也有一条溪沟，那流水就是通过凤凰门（闭门）入江的。虽然如此，那闭门依然不是“门”，只是下水道通过的一个地方，而那下水道也不可能有城门那样的体量。其实，在没有闭门的地方，也有不少这样的下水道。东水门城外左侧至今还可以看到下水道的遗迹。

江浙一些古城，有所谓的水门。但那水门不是闭门，虽然可能矮小一些，但还是可以沟通城里城外的，甚至还可以行船。世界上那么多古城，好像还没有哪一座古城有重庆这样的闭门而且还有八座之多。可以说，闭门也是重庆城的一大“特产”。

为什么要设闭门？城门因为有“门”故是防守的薄弱地方。在冷兵器时代，攻城往往就是攻城门。城门建多了，受敌方攻击的地方就多，这对防守是极其不利的。城门少了不便于人员和物资的进出，不便于抗击攻城者，更不便于反击；城门过多又增加了防守的薄弱环节；为了平衡，于是就要修建敌楼。敌楼也叫谯楼，就是修建在城墙上（也有的修建在城中）的高楼，一是用于瞭望，有敌人来，可以提前发现；二是便于打仗时将领坐镇指挥；三是便于囤兵囤粮囤兵器；四是万一敌方攻上城墙，还可以在敌楼里困守。重庆的闭门，实际上就是敌楼，只是其他古城没有在敌楼下的城墙上修建城门的样子，而重庆修建了。闭门既有囤兵囤粮囤兵器之功，又无防守薄弱之弊。重庆的闭门大多建在地势险要处，可能主要起着支援开门的作用。彭大雅筑重庆城，在那城墙上可能也建有若干可囤兵囤粮囤兵器的敌楼，在抗击元蒙铁骑进攻时，敌楼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戴鼎想出了建闭门的法子，

^①林正才：《守城录注译》卷二《陈规·守城机要》，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64页。

为中国古代筑城史留下了特殊的一笔。

重庆城门格局独特

重庆城门的格局也很独特。首先，重庆城的大多数开门与平原城市不同。平原城市城门内外往往是齐平的，城门后面就是大街，城门一破，守军往往无险再守。重庆城的城门外往往有一面陡坡，攻城只能是仰攻；即使攻破城门，进城门后往往还有几十步陡峭的石梯，在城门处形成类似于瓮城的格局，守军依然可能居高临下守卫。有的城门，例如金紫门，因为城门内外落差太大，悬崖异常陡峭，从江边进城，有一两百步云梯式的石梯。那石梯从江边延伸到城门，再从城门延伸到城里，就连城门下也是石梯，而且中间没有台阶来间隔。那石梯每步只有十来厘米宽，放不下一只脚，行人往往只有侧起身子走路。从城外看，那城门异常高峻；从城里看，那城门却像一个地底下的深洞，与平原城市的城门完全相异。其次，重庆城的城门往往根据自身所在的地形地貌，通过多种手段来增强防御能力。一是城门大多设在城墙的转角处，进城的道路往往就在某一边

的城墙下，道路的另一侧则为悬崖陡坡，攻城者必须从这样的道路进攻，也就必须承受来自城墙上守军的打击。二是九座开门中有七座有瓮城，瓮城城墙几乎都低于主城城墙，可以更好地打击进犯之敌。东水门虽然没有瓮城，但城门与城墙形成夹角，便于打击进犯者。进入东水门后，要爬上城门，要进入城墙，依然还有十余步石梯，其实已经形成类似瓮城的格局，守城者还可以进行反击。金紫门的地形地貌虽不可能修建瓮城，但进城的石梯太陡峭，其防卫能力可能比其他城门更强。三是除临江门外，其



保存完好的东水门

他六座瓮城的城门朝向都与主城城门的朝向不一致，一般都转了一个90度的角，这也增大了攻打的难度。四是重庆城的好几座城门都是两层。从如今保留完好的东水门和通远门可以看到，攻进第一道城门后，城门所在城墙中间有一个天井，城门上的守军可以从天井上往下投掷石头之类，阻止进犯者冲破第二道城门。这样的格局，土城、砖城几乎是不可能修建的，我们也没有在重庆城之外的其他古城中看到过。

重庆城门大多采用闸门

重庆城九座开门，大多采用闸门。闸门可以迅速滑下关闭，可以做得更加厚实，可以更好地抗击冲撞，可以抗击敌方的冲机（一种攻打城门的兵器），其防卫能力比扇门（特别是对开扇门）更强。一般来说，闸门加上铁条后，往往只能冲烂，不大可能冲开。扇门是用门栓顶住的，固定门栓的卡子虽然嵌入到城墙里，但也经不住冲机的猛烈冲击，被冲开的情况就很普遍了。闸门的起降也比扇门的开关快，打开时用辘轳摇起，固定时用卡子卡住，放下时取下卡子闸门一下就下滑到位。但是，要采用闸门形式，首先，城门不能太宽，也不能太高。

重庆城门大多只有三米多宽，不到五米高，适合古代闸门。其次，城门及城门上部的城墙中要便于修建滑槽。重庆城门及城门上下左右的城墙都是用条石修建的，修建滑槽很方便。再次，城门上要方便安装起闭设备。重庆城门都是条石砌成的，城门上均有城楼，安装起闭设备没有问题。古代城里都要宵禁，每到天黑，那城门就从城楼上滑下来，城门就被封死，任何人都不能进出了。如今，我们在保留下来的通远门还可以看到闸门的滑槽。

总之，重庆城的这十大特点决定了重庆城的防御能力相当强，可谓固若金汤。当然，战争，包括战争中的防御，正如不能仅仅只凭武器好坏一样，也不能仅仅只凭城池坚固。城池坚固可以增加防御能力，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性质和趋势。如果从巴国建江州城算



晚清时候的通远门

起（巴人是否筑城已不可知），三千多年来重庆经历了数不清的战乱，闪亮过不知多少攻防易手的刀光剑影，但是直接攻打重庆城的战例却并不多。重庆城经历过元蒙铁骑的攻击，也经历过明末清初近百年的战乱，均未发生过特别激烈的攻城战事。在这样易守难攻的城墙和城门面前，攻城一方如果不采取突袭的战法，或者没有内应，是很难攻破的。历史上，只有张献忠攻下过重庆城。他是如何攻下的，限于历史资料的贫乏，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民间曾经流传过很多有关张献忠攻打通远门的故事，有人说他使用了奸细入城、诈降、阴门阵、穴城法等好多诡计，最后通过挖地道炸垮了通远门，才攻破了重庆城，可以说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重庆城易守难攻的特点。

其实，张献忠攻打重庆也应当算是奇袭。张献忠从湖北入川，溯江而上，势如破竹，明军纷纷败逃。但打到重庆城东40里的铜锣峡（阳关）时，却久攻不下。张献忠善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他留下大部队继续佯攻，自己则带着少数轻骑，抄小路疾驰150里奇袭江津，

然后顺流而下。那时，明军主力在铜锣峡，重庆城里并没有多少守军，见张献忠杀来，已经吓破胆，守将甚至都想逃跑了。只是巡抚陈士奇坚持才守了一两天。《绥寇纪略》说：“诸将请背城一战，（陈）士奇不许，曰：‘若辈（你们）欲走（逃跑）耳！’”即可证明。张献忠六月二十一日（农历）占领佛图关，然后打南纪门遇阻，再打通远门，二十三日（农历）就攻下重庆城，前后只有两三天，哪有时间去“多穿地道”？可以说，张献忠攻打重庆，几乎是“不战而屈其兵”。如果真的像传说中打得那么激烈，张献忠肯定不会让自己损兵折将去硬攻的。但不管怎么说，张献忠攻打通远门，依然是重庆城历史上最激烈的一场攻城之战。如今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前的那些雕塑，或许也是当年攻城的写照吧？来到通远门前，或许还可以听见当年的厮杀之声。

（作者单位：市公安局 退休）

责任编辑：陈 伟

王十朋为官夔州的历史与贡献

谢 超

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作为南宋巴蜀东部门户，因地处长江三峡要冲，兼具军事战略价值与文化枢纽地位。绍兴年间，宋金战乱频仍，加之地方官吏苛政盘剥，夔州社会经济陷入困顿。绍兴三十一年（1161），南宋状元王十朋因力主抗金、弹劾权贵被贬任夔州知州，开启为期三年的地方治理生涯。学界对王十朋的研究多聚焦其朝堂谏言与诗歌总集《梅溪集》，而对其夔州施政实践及地方影响的系统梳理尚显不足。本文结合《宋史·王十朋传》《梅溪集》及夔州地方志史料，从生平溯源、施政举措、文学贡献、民心纪念四个维度，挖掘王十朋为官夔州的历史价值，揭示其“为官有担当、为文有风骨”的精神内核。

一、王十朋生平溯源：状元风骨与民本初心

（一）早年治学：奠定“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

号梅溪，南宋温州乐清人。年少时先后就读于鹿岩乡塾、金溪邑馆、乐清县学，三十三岁在家乡创办梅溪书院授徒，次年入太学。绍兴二十七年（1157）中状元，初授绍兴府签判，历任宗正丞、司封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国子司业。宋孝宗继位后，历任起居舍人兼侍讲，外放治理饶州、夔州、湖州、泉州。乾道七年（1171），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卒于家中，终年六十岁。绍熙三年（1192），宋光宗追赐谥号“忠文”。

王十朋以儒家经典为治学根基，晨诵《论语》悟“仁政”之道，夜研《孟子》明“民为贵”之理，床头题“以天下为己任”以自勉，形成“重道义、轻名利”的人格底色^①。四十六岁的王十朋在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赴临安参加殿试，面对宋高宗直言痛斥秦桧余党弄权误国，力陈“任贤、纳谏、赏罚分明”的治国方略，其文辞恳切、立意高远，获高宗赏识，钦点为状元，开启仕途生涯。

^①脱脱等：《宋史·王十朋》，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45—11948页。

（二）朝堂为官：坚守直言敢谏的政治品格

中状元后，王十朋历任秘书省校书郎、起居舍人等职，始终以“遇不平则鸣”为准则。他多次弹劾贪官污吏，主张坚决抗金，反对与金议和，即便触怒权臣、身陷险境亦不妥协。绍兴三十一年（1161），因反对朝廷妥协政策，王十朋被贬为夔州知州。友人劝其“收敛锋芒以自保”，他却在《自勉》诗中以“铁骨岂因贬谪折，丹心仍为家国燃”明志，展现出“为官在民不在位”的价值追求^①。这种坚守，为其后续在夔州施政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王十朋夔州施政实践：以民为本的治理路径

（一）整顿吏治：革除弊政以纾民困

抵达夔州后，王十朋通过实地勘察发现，地方吏治腐败是百姓苦难的核心症结：官吏私吞朝廷赈灾粮款，巧立“盐税”“杂役钱”等名目盘剥百姓，仅盐税一项便超朝廷规定三倍，导致“百姓卖尽口粮仍不足缴赋”^②。针对此弊，他采取三项举措：

其一，清查账目。亲自核对州府历年赋税收支，揪出一批私吞赋税、倒卖官粮的贪官污吏，将其罪行公示于州府石碑，接受百姓监督。其二，制定章程。

颁布《夔州赋税章程》，明确“只收朝廷正税，禁绝一切额外摊派”，并将章程刻碑立于州府大堂，杜绝官吏滥用职权。其三，严惩贪腐。面对行贿与地方势力威胁，坚决弹劾罢免贪腐官员，强调“官吏食君之禄，当为君分忧、为民解愁，若借权敛财，与盗匪何异”^③。

经此整顿，夔州吏治焕然一新，百姓赋税减轻大半，逃亡流民纷纷返乡。

（二）安抚流民：恢复民生以稳社会

战乱与苛政导致夔州流民众多，露宿街头、无食可依者遍布城乡。王十朋以“安居方能乐业”为原则，推行系列安民措施：

一是开放粮仓。下令调拨州府储备粮，为流民发放口粮，解决基本生存问题。二是分田定居。在城郊划出闲置土地，分配给无家可归者耕种，并减免三年赋税，鼓励流民扎根。三是以工代赈。组织流民修缮破损房屋、道路，既解决生计，又改善地方基础设施。四是助农复产。从外地引进耐旱稻种，邀请农师传授耕作技术，同时修缮乡间小路，方便农产品运输^④。

至隆兴元年（1163），夔州农田复绿、市集复苏，百姓生活逐步恢复常态。

（三）兴办教化：涵养民心以固根本

王十朋深知“治民先治心，治心先

①王十朋：《梅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21—322页。

②奉节县志编纂委员会：《奉节县志》，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07—208页。

③奉节县志编纂委员会：《奉节县志》，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09页。

④王十朋：《夔州到任谢表》，《梅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15页。

教化”，针对夔州因战乱导致的“州学荒废、孩童失学”问题，实施三项教化举措：

第一，修复学堂。下令重建州学与乡间私塾，挑选学识渊博、品行端正的儒生任教，并发动捐赠个人藏书数千卷充实学堂。第二，亲自讲学。每月初一、十五赴州学讲授《论语》“仁者爱人”、《孟子》“民为贵”思想，鼓励学子“学有所成后回报家乡”。第三，重修三贤堂。修复纪念屈原、诸葛亮、杜甫的“三贤堂”，亲自撰写碑文，提出“以先贤为镜，以民生为念”的教化理念^①。

这些举措推动夔州学风渐浓，不少贫家子弟入学成才，为地方培养了一批“为民、务实、清廉”的贤士良吏。

三、王十朋夔州诗：民生情怀与家国担当的文学表达

（一）民生诗：刻画百姓疾苦的现实镜像

王十朋在夔州期间，以诗歌为载体记录百姓苦难，形成“直白质朴、字字含情”的民生诗风。如《夔州叹》中“苛税如刀割民肉，流民似叶逐风飘。我愿为官皆似此，不教百姓泪空抛”，直接揭露赋税苛重的现状；《街头叹》中“稚子街头乞残食，不知书声为何物。何日学堂遍乡野，让尔执笔识诗书”^②，则表达对孩童失学的忧虑。这类诗作无华丽

辞藻，却以真挚情感展现“为官者与民共情”的境界，成为研究南宋夔州民生的珍贵史料。

（二）山水诗：融合夔州风光与历史沉思

夔州的雄奇山水为王十朋提供了丰富创作素材，其山水诗兼具景观描绘与历史感慨。《白帝城》中“白帝城头望大江，瞿塘峡口浪飞扬。千年往事随涛去，唯有青山立莽苍”，既展现长江三峡的磅礴气势，又借景抒发对历史变迁的思考；《夔州十绝》则以组诗形式咏叹夔州风土人情，如“杜甫堂前竹尚青，诗魂长伴峡江声。我来欲续先生句，又恐才疏愧此情”^③，既表达对杜甫的敬仰，又传递“心忧百姓”的共鸣。

（三）爱国诗：彰显乱世中的家国情怀

虽远在夔州，王十朋始终心系抗金大业，其爱国诗充满“虽处江湖之远，仍忧其君”的赤诚。《登瞿塘峡》中“瞿塘险过剑门关，北望中原泪潸然。若得请缨驰战马，何惧沙场裹尸还”，直抒报国之心；《感怀》中“身为逐臣守夔州，心随征雁到临安。愿君莫忘中原恨，早整戎装复河山”^④，则劝谏朝廷不忘收复中原。这些诗作超越一般山水之作，成为南宋爱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民心纪念：梅溪河与王十朋精

①奉节县志编纂委员会：《奉节县志》，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12—313页。

②王十朋：《夔州叹》，《梅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03页。

③王十朋：《夔州叹》，《梅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12—513页。

④王十朋：《登瞿塘峡》，《梅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21页。

神的传承

（一）梅溪河命名：百姓自发的纪念方式

隆兴元年（1163），王十朋因政绩卓著调回临安，夔州百姓自发沿街送行，从州府至长江码头，百姓手持酒浆、干粮，含泪挽留。离任后，百姓为永久纪念这位“好官”，一致决定以其号“梅溪”将奉节北岸曾见证其施政与讲学的无名河流命名为“梅溪河”。百姓称：“河流滋养夔州土地，如王知州滋养百姓；河流永不干涸，如我们对王知州的怀念永不消散”^①。这一命名，成为“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的生动体现。

（二）梅溪祠修建与后世传承

此后，百姓在梅溪河畔修建“梅溪祠”，供奉王十朋画像，刻其诗作与《夔州赋税章程》于墙上。明清时期，历任夔州官员上任前必赴梅溪祠拜谒，沿梅溪河行走感悟民心道义，以王十朋为榜

样立下“为民造福”^②誓言。如今，梅溪河仍滋养奉节百姓，梅溪祠历经沧桑也保存完好，王十朋诗作收录在地方志书、《夔州诗全集》，成为当地学子的必读篇目，其精神通过实物与文字代代相传。

王十朋的夔州岁月，不仅是一部地方治理史，更凝聚着“不为名利、只为民生”的为官初心与“身处乱世、仍守风骨”的文人品格。在当代，这种精神仍具重要现实意义：它不仅提醒公职人员坚守民本思想、担当社会责任，也为文化传承提供了“以先贤为镜、以初心为灯”的价值指引。八百年后的今天，梅溪河畔的流水仍在诉说着这位状元知州的故事，其精神将永远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财富。

（作者单位：重庆修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怡彤

^①奉节县志编纂委员会：《奉节县志》，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456页。

^②奉节县志编纂委员会：《奉节县志》，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457页。

300年前地契的历史解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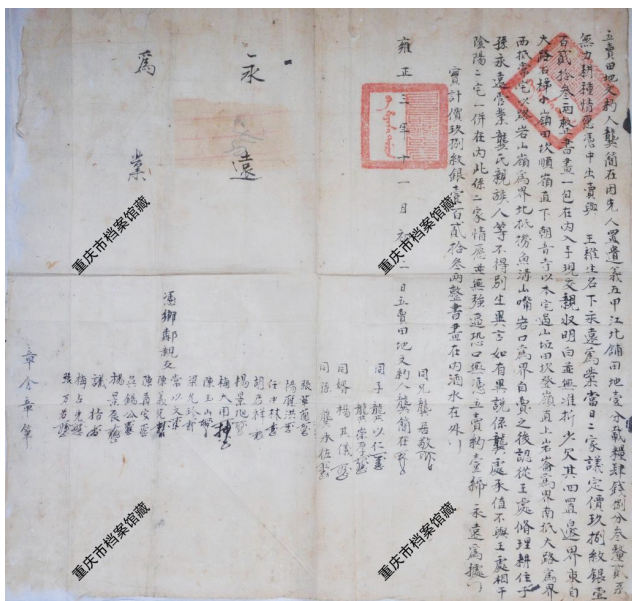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中最早的档案

曾向前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最早的档案，是清雍正三年（1725）形成的一份地契，即龚氏卖田地给王氏所立文约，至今已有300年时间。文约内容如下：“立卖田地文约人龚筒在，因先人置遗，义五甲江北铺田地壹分，载粮肆钱捌分叁厘贰，系无力耕种，情愿凭中出卖与王杂生名下永远为业。当日二家议定价玖捌纹银壹佰贰拾叁两整，书画一包在内，入手现交亲收明白，并无准折少欠。其四置边界，东自大路石梯小岭田坎顺岭直下朝音寺，以本宅过山垵田坎登岭直上岩仑为界，南抵大路为界，西抵常宅以路岩山岭为界，北抵捞鱼沟山嘴岩口为界。自卖之后，认从王处脩理耕住，于孙永远管业。龚氏亲族人等不得别生异言。如有异说，系龚处承值，不与王处相干。阴阳二宅一并在内，此系二家情愿，并无强逼。恐口无凭，立卖约一纸，永远为据。实计价玖捌纹银壹佰贰拾叁两整，书画在内，酒水在外。”落款时间为“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二日”。立约人为龚筒在及其兄、子、

婿和孙，见证人为“乡邻亲友”张华兰等（共16人），并均在各自姓名下方画押。文约执笔人为章含章。在文约右上方和落款处钤盖朱红官印。

这份跨越300年时光的清代地契，不仅记录着一桩清代土地交易的来龙去脉，还承载着当时行政制度、地理区域、赋税体系、民间习俗等诸多历史信息，让我们从中得以窥见清代基层社会运行的真实肌理。



雍正三年（1725年）龚氏卖田地给王氏所立文约

一、盖有官印的红契：从私约到法定的凭证

这份地契最醒目的标识是两处红色钤印。在右上方和落款处各钤印一次，是旧时契约首尾双印的惯用格式。印文为“巴县印”三字，采用满汉双文合璧，左为满文，右为九叠篆汉文，呈正方形，此为清代知县官印的标准形制。官印的存在，表明这份地契从民间私契到官方认证的法定属性的转变。在古代，地契若仅由立约人签名或画押，称为“白契”，仅具民间约束力；而经官府核验并加盖官印后，便成为“红契”，具备法定效力，是产权转移的终极凭证。

根据大清律例，民间土地交易需在成交后赴县衙投契纳税，经官吏核查产权无争议、税银缴纳完毕，方可加盖官印。按照康熙后期“司颁契尾”相关规定，县衙在办理土地交易手续时，需使用布政使司统一版本的契尾，在契尾上填写相关信息并钤印，而契尾通常有前后幅两联，前幅粘贴于地契文末由业主保存，后幅留存官府备查。从这份地契保存现状看，契尾部分已不存在，这应该是当年粘贴不牢加之年代久远而脱落遗失了。

从白契到红契的转变，本质是民间交易获得官方认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土地交易被纳入国家治理范畴，既保障民间产权清晰、避免纠纷，又强化赋税管理、增加财政收入，此乃中国古代以契治地的生动样本。

二、地契中的地理地名：历史传递的区位信息

地契中明确记载，所卖田地位于“义

五甲江北铺”。“义五甲”并非简单的数字编号，而是里甲制度下的行政地理单元。据乾隆《巴县志》记载，巴县划分为12里，“义”乃是12里之中的义里，下辖10甲，“五甲”即义里所辖之一甲，其地理范围对应今天哪些区域尚待进一步考证。“江北铺”更值得推敲。这里的“铺”，应该指古时的“急递铺”或“铺递”，是古代官方设立的传递公文、接待过往官员的基层机构，属于邮驿体系的一部分。乾隆《巴县志》记载，“府门铺司兵八名，每名银一十两。江北等一十四铺，每铺三名；佛图等七铺，每铺五名；……”。可见，当时在巴县确实设有江北铺。乾隆十九年（1754）巴县析出江北镇、设置江北厅，乾隆二十四年（1759）巴县义里、礼里及仁里上六甲划归江北厅（史称“江巴分治”），此时“义五甲江北铺”便随之由巴县治下划归江北厅治下。

地契在田地“四至”描述中提到的潮音寺，在清代方志中确有记载。清道光年间编《江北厅志》中的江北城图上就标识有潮音寺，紧挨着问津门。2005年版的《重庆市志》也记述了历史上的慈善组织体仁堂于“清乾隆四年（1739）设在江北潮音寺”。据2014年2月10日《重庆晚报》所载江春葆《寻找潮音寺》一文所述，民国时期还在潮音寺设立体仁堂中心学校，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体仁堂小学校改扩建，潮音寺才“彻底泯灭了”。而今，在江北城问津门旧址处的梁沱岸边岩墙下设有一座

供奉“梁沱水观音”的小庙，也被称作潮音寺，实则是本世纪初相关人士捐资修建的，其所处位置应与原潮音寺相差无几。由此可见，300年前龚氏卖给王氏的“义五甲江北铺田地壹分”应该处于现在“梁沱水观音”所在岩墙以上的相邻区域。其中，更具史证价值的是，江北潮音寺一般被记述为建于清乾隆年间，而这份地契则表明它在清雍正三年（1725）时就已经存在。

三、土地交易官民共治：里甲制度的基层实践

这份地契呈现出清代土地交易官民共治的情形。其中“义五甲”，不仅是行政地理标识，更指向一套严密的基层管理机制。

土地交易前，里甲中的“甲长”需确认卖方龚筒在的业主身份，核查“鱼鳞册”^①中该地块的记录，确保无重叠典卖、隐漏赋税等问题。地契中“同兄龚居敬、同子龚以仁”等家族成员的联合署名画押，实为甲长要求的家族认证，即在“家产共财”的传统下，土地处置需经家族集体同意，避免日后纠纷，这是里甲“民管”功能的体现。

交易后，里甲的“里书”^②需更新“鱼鳞册”，完成“推收过割”。同时，通过将赋税从龚氏转移至王氏，确保国家税源不流失。这种民间交易、里甲核验、官府备案的流程，形成民、甲、官三级共治体系，既尊重民间交易自主性，又

将其纳入国家治理框架。

四、“载粮”中的土地赋税：粮随地转的制度逻辑

地契中“载粮肆钱捌分叁厘贰”的记载，看似简单的数字，实则暗藏清代赋税制度逻辑。“载粮”即该土地应当承担的赋税额度。清代前期实行人丁税与土地税并行的制度，弊端丛生。雍正二年（1724）推行“摊丁入亩”，将人丁税并入土地税，从此“地为税本”，土地成为赋税征收的唯一基准。这份地契形成于推行“摊丁入亩”的次年，“载粮”数额的精确记载正反映出当年“摊丁入亩”改革后的赋税管理状况，同时也明示着买方购入田地后需同时承接这笔赋税，即“地随粮走、粮随地转”。

其中，土地税额和交易价格暗藏玄机。当时全国土地税（地丁银）通常每亩在几分到一钱多，即使是当时赋税较重的江南地区，上等田每亩税额一般也不超过一两银，也就是，每分地一般不超过一钱银，而这份地契中“田地壹分”却“载粮肆钱捌分叁厘贰”，显然是远超全国水平，属于异常高额。这或许跟土地等级高、附加税或地方摊派多、面积计量特殊（如“大亩”“小亩”的区别）等因素相关。此外，土地卖价高达“玖捌纹银壹佰贰拾叁两整”，即使“阴阳二宅一并在内”，也属畸高。这应该跟地块所处位置相关。这块地紧挨“江北铺”与“潮音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①鱼鳞册：里甲登记土地的簿册。

^②里书：负责文书登记人员。

风水好且人气旺，营生条件非一般民田可比，也就堪似今天黄金地段的地价房价。

五、“书画一包在内”：民间档案的管理应用

地契中记载，在土地交易同时，还完成“书画一包在内”的交接。此“书画一包”并非今天所谓的名人字画，而是一套完整的土地“身份档案”。其中，应该包含以往交易过户的契约、缴纳赋税的记录、家族分产文书乃至官府确权文件以及田地“四至”边界图画等。这些文书材料环环相扣，构成土地从过往到当下的流转轨迹，清晰记录着每一次易主、每一笔税负，证明土地根脚干净、来路清楚、权属正当，无典当、抵押等纠纷。这种操作方式，体现着古代民间对产权追溯的精密考量，折射出民间早期朴素而又严谨的档案意识。

在缺乏现代产权登记制度的时代，这套档案是交易合法性的核心凭证。买方需逐件核验旧契，确认产权链条完整；卖方则将“书画一包”随产权交割，彰显转让的彻底性。这种在民间出于对自身重大私产或核心利益的保护而自发形成的档案管理与运用，是非国家机构运作下的民间档案行为，是档案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初始形态，这对于今天考察研究地契档案的流转、家庭档案的源起以及民间契约文化历史均有重要价值。

六、“酒水在外”：民俗中的社会契约

在我国民间，历史上有着立契设宴

的习俗，以此表示庆贺、酬谢、见证等多重意思。地契中“酒水在外”四字，是指交易价中并未包含置办酒席的开销（一般由买方买单）。这看似是交易账目上的细分明晰，实则是清代乡土社会契约的仪式化表达。在当时民间土地交易并非小事，而是牵动家族与社群的大事。设宴办席便是社群参与契约的核心场域，乡邻亲友、耆老乡绅围坐一堂，既是买卖见证者，更是契约担保人。席间承诺通过熟人社会的舆论环境形成“违约成本”，若是一方反悔，将面临乡邻非议、信誉扫地的风险。

在现场交割的银两是土地的经济价值，而置办酒席的开销则是购买社群认同的社会成本。“酒水在外”将人情从银钱中剥离，却又以设宴方式将二者绑定——经济契约在社会契约加持下更具生命力。这种安排，在当时司法力量十分薄弱的基层民间，可以起到以宴证契、以情固约的效果，从而让现场的见证与乡邻的监督构成比条文更坚韧的约束，让一纸地契真正嵌入社群的信任网络之中。

这份地契，作为产权证明早已过时作废，但其作为档案的历史价值却弥足珍贵。三百年后的今天，它仍在诉说着历史的细节，演播着当时民间土地交易的场景，让我们得以真切地触摸到那个远去时代的基层治理逻辑与世俗生活温度。

（作者单位：市档案馆）

责任编辑：周怡彤

一份百年分家文书背后的秘密

费国容

古人言：“树茂则分枝，子盛则分爨。”

“分爨”又称“分家”，在古代农耕社会，随着家族繁茂，子嗣增多，分家是家庭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面对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农村有两个及以上儿子的家庭，为避免家人之间的磕磕绊绊，往往会通过分家来寻求和谐共生。

笔者偶然见到一份来自万盛经开区金桥镇金堰村的分家文书。这份文书，签订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初二日，距今已有180余年的历史，详细记载了当时普通人家的分家细则。原文如下：

立出分关，拈阄为凭，文约人刘李氏将父母分受得买之业：一处地名河坝王家塘落凶；二处地名当门塘团坵一连五块；三处地名碾场塘；四处地名茶王堡跟田角直上山顶节连铁炉塘山王息行在内；五处地名芋头田角起界，跟人行路横过竹林塘，跟仑坎直过以抵周氏坟，直下以抵人行路；六处地名牛市岗上段息行在内，凭众分与么男刘继濬耕种管理，永远为业。自从父母分受过后，任

随各人开辟，不得已（以）大期（欺）小，以体祖人之德。其有四置界畔，以凭诸亲、家门、叔侄，脚踏手指分明，其有再粮共纳均分上纳外，有边界不得罢战（霸占）欺心。今恐人心大便（变），故立分关拈阄为凭，永远为业。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二日。

分关拈阄为凭人 刘继清 周仕桂 黄文玉 刘学舜 杨在银 刘继汶 刘继治 黄文友 伏先升 张必选 王思仲 文明万 李启常 全见

咸丰十年庚申岁（1860）八月初十日，胞兄继瀛凭众将受分之业地名节业塘地基垣坝芋头田一块，当塘田一块，凭众易与胞弟为业，其有地基大壁，胞兄继瀛世代毋得蓄积树木以侵基址，永远存□。

凭众人 李慧堂 王思仲 周正林 周百川（笔）全见

还有外人曾到弟兄名下边界，弟兄一同均分。

依口代笔 谢元川

文中“分关”即“分家”，这份分家文书受产人是兄弟两人，此份写了弟弟分得田产情况，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哥哥那一份。

文书内容详细，条理清晰，第一部分详细记录了分授予么男田地的四至边界、位置和数量；第二部分是嘱言，“自从父母分受过后，任随各人开辟，不得已（以）大期（欺）小，以体祖人之德”，体现了长者的谆谆教诲；文末有立书年份、众亲见证。分书骑缝处留有半引“合同□□存照”以做证，兄弟两人对半留存，可见这份分书的科学严谨。这种沿用自三国时期的押缝形式可以避免对契约文书的伪造，也是如今在合同、公文上加盖骑缝章的由来。

咸丰十年庚申岁八月初十日（1860年9月14日），分书内容有增补，哥哥刘继瀛凭众将受分之业地名节业垮地基垣坝芋头田一块，当垮田一块，凭众易与胞弟为业。另有一句嘱言“其有地基大壁，胞兄继瀛世代毋得蓄积树木以侵基址”。这句嘱言很有意思，体现了古人对房屋地基的重视。古人有言“房前不种树，屋后不种花”。表面看是注重风水，实则是古人的经验总结。一方面因为古代房屋低矮，房前种树遮挡阳光；另一方面树木长成后根系就会越扎越深，会破坏房屋的地基，地基不牢固，有倒塌的风险。该句嘱言，先说断后不乱，避免了日后的纷争。

虽然过去100多年，但这分家文书依然字迹清晰，字里行间反映了百年前普通百姓的分家实态，对于研究当时的文化习俗及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纵观历史，我国的分家习俗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实施二次变法，其中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要求家有成年男子二人以上者另立户籍，其目的是增加劳动力和纳税服役的人口。后来，分家成为中国延续几千年的老传统。

农村分家受产人主要是弟兄。如果父母在世，不愿与儿子同住，父母与儿子共同作为受产人。与当今男女平等不同，一般嫁出去的女儿很少作为受产人，只有未出嫁时，会考虑部分嫁妆。

农村分家很少诉诸法律，一般是在家人有分家意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邀请第三人主持分家程序。主持人主要是亲族中有威望的尊长，他们一方面发挥主持、协调作用，另一方面起到见证作用，使整个分家活动能够以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还有其他参加分家析产活动的亲属、朋友、见证人和代书人，涉及两类，一类是族长、娘舅、堂伯叔兄弟等有亲属关系的人，一类是无亲属关系的代书人、中间人等。

分家过程中，财产的拼搭是最重要的环节，稍有不慎，就会为家庭埋下矛盾的种子。一般由父母将全部家产告知

分家的参与者，根据分配的份数，大家一起协商讨论。在普通农村家庭，大家最在意的莫过于房屋、田土、山林的分配，因为这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房屋”的分配大多遵循古代礼法长幼有序的原则，即“长尊为左，次幼为右”，分歧并不大。田土有“高低好歹”“肥瘦阔狭”，分配上往往慎之又慎，但也做不到绝对的公平，只是相对平均搭配，大家达成共识即可。

家产搭配好后，一般通过“拈阄”的方式，来确定最终的分配。主持人根据份数，将写好字号的阄单揉成纸团，受产人拈取，拈得的阄号代表分得的财产。“拈阄”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分配各种民事利益的最原始、最朴实和最受人信赖的方式，其规则源于先秦时期的“投钩分财”之制。据《慎子·威德》记载：“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恶者不知所以怨，此所有塞愿望也。”意思是通过本人亲手阄取的财产无论好坏，都无从埋怨。此处的“投钩”就是后世俗称的“拈阄”。民间分家大部分采用“拈阄”的方式进行。

“口说无凭，立字为证。”析产完毕，由代笔人拟订分家文书。“分家文书”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有“阄书”“阄分合同”“析产阄书”“分书”“勾

书”“分单”“支书”“标书”“标单”“关书”“分产议墨”“议墨”“分产议约”等称谓，其中以“阄书”“分书”较为常见。分家文书不同的地方样式不一，一般会按照兄弟数目，各写一份。分书正文大致交代分家人、受产人、分家原因、财产分配等情况，文书末尾，主持人、受产人、见证人等署名画押。如果是兄弟两人，则会在两份文书的中间留下“合同存照”等字样，如果弟兄多，则按“天”“地”“人”“忠”“义”“信”，或者甲、乙、丙、丁等序号编写。从此，各执一份分家书，作为凭证。分家程序告一段落。

但在农村，并不是所有家庭分家都会拟订分家书，家庭关系稍微简单的，也会以口头达成的协议为准。

分家，看似原有家庭结构的分裂、拆解，实则是家庭关系的一次重构。古代的分家文书也无异于一部微型的家族法典，对于减少家庭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代的分家文书逐渐淡出大众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完备的法律体系。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地方志编修中心）

责任编辑：熊蜀黔

焦石民歌：流淌在大山深处的美妙旋律

冉启蕾

涪陵区的焦石镇地处武陵山区，是乌江少数民族文化与长江文化交集地带。特殊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巴楚古风遗韵与本土农耕文化在这里相互融汇，产生和积淀了极其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民间歌谣，为焦石民歌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沃土。人们以山歌协调繁重生产中的劳动节奏，排解身上的疲劳和心中的忧愁，抒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焦石民歌的兴起

焦石民歌最初起源于古代巴渝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种古老民歌体裁——竹子歌（亦称为“巴渝曲”“巴渝辞”），生活气息非常浓郁。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过程中，涪陵焦石镇及周边相邻地区逐渐孕育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焦石民歌。焦石民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地域色彩，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巴蜀民间广泛传唱的一种古老民歌体裁——“巴渝曲”，成为“巴渝曲”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重要代表之一。

焦石民歌传播方式主要是口口相传，并在世代传唱中不断加工提炼，其歌词

内容涉及广泛、绚丽多彩，语言简明，音乐短小精悍。可以这样地说：焦石民歌逼真地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劳动、民风、民俗、情感和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内容，蕴含着丰富的巴渝民间传统、民俗资料 and 历史文化信息。

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民间文艺普查和近年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焦石民歌现存有生活歌谣、劳动歌谣、时政歌谣、风俗歌谣等类型，有情歌、栽秧歌、打场歌、盘歌、斗歌、翻叉除草歌、儿歌、放牛歌、请茶歌、哭嫁歌、薅草打闹、石工号子等 100 多个品种若干首歌谣，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有独唱、对唱、领唱、联唱、轮唱等多种演唱形式。

笔者对焦石民歌进行了 10 多年的研究，数十次深入焦石采风，从 2013 年开始，已参加了五届焦石民歌实景版、舞台版、广场版的策划、创作、编导及演出，对焦石民歌的收集、挖掘、传承和发展情有独钟，总希望那一首首浸润着山民们朴实性格的焦石民歌，能被更多的人知晓和传唱。

二、焦石民歌的分类

焦石民歌的歌词主要分为生活、爱情、劳动三个大类，这些简单朴实的歌词，永远浸润着浓浓的乡音和乡愁。下面，略举几首焦石民歌的歌词，可以感受到其歌词的魅力和劳动人民的智慧。

1. 生活类的焦石民歌

《唱山歌》反映了焦石人民爱唱山歌的性格：

太阳出来我要唱歌，要唱歌哟喂，
月亮出来我要唱歌，要唱歌哟喂，焦石
民歌哟爬上坡哟，田间地头才开口哟喂，
千山万岭歌来和哟喂……唱起山歌人最
美，人最美哟喂，山歌唱出好生活，好
生活哟喂，世世代代歌不断，山歌唱出
好生活……

《放牛歌》反映了小孩子上山放牛时的喜悦心情：

对门的娃儿也，来也放牛哟喂，牛
儿嘛赶到啰儿啰，沟里头哟喂。背靠背
来也，手也牵手哟喂，焦石山歌啰儿啰，
不离口哟喂。

对门的娃儿也，来砍柴哟喂，刀没
嘛磨快啰儿啰，也要来哟喂。对是对来也，
排是排哟喂，焦石山歌啰儿啰，唱起来
哟喂哟喂……

《盘歌》（即一问一答对歌）反映
了一群青年男女对歌时的机智：

问：哟呵喂，哟儿那个喂，高师傅
迈老先生，这首盘歌迈问你们，啥子出来
高又高？啥子出来半中腰？啥子出来用
连盖打？啥子出来用棒棒敲哟？

合：啥子出来用连盖打？啥子出来
用棒棒敲哟？

答：哟呵喂，哟儿那个喂，高师傅
迈老先生，这首盘歌我解得清，高粱出
来高又高。苞谷出来半中腰。黄豆出来
用连盖打，芝麻出来用棒棒敲哟。

合：黄豆是出来用连盖打，芝麻出
来用棒棒敲哟。

问：哟呵喂，哟儿那个喂，高师傅
迈老先生，这首盘歌迈问你们，啥子出
来红又红？啥子出来弯囡囡？啥子出来
是悬吊起？啥子出来像条虫？

合：啥子出来是悬吊起？啥子出来
像条虫？

答：哟儿喂，哟儿那个喂，高师傅
迈老先生，这首盘歌我解得清，海椒出
来红又红。丝瓜出来弯囡囡。茄子出来
是悬吊起，豇豆出来像条虫。

合：茄子出来是悬吊起，豇豆出来
像条虫。

问：哟呵喂，哟儿那个喂，高师傅
迈老先生，这首盘歌迈问你们，啥子出
来背朝天？啥子出来三角尖？啥子出来
横担起？啥子挑起是不换肩？

合：啥子出来是横担起？啥子挑起
是不换肩？

答：哟呵喂，哟儿那个喂，高师傅
迈老先生，这首盘歌我解得清，犁辕出
来背朝天。铧口出来三角尖。牛打脚出
来是横担起。牛儿挑起是不换肩。

合：牛打脚出来是横担起。牛儿挑
起是不换肩。

2. 爱情类的焦石民歌

《十劝姑娘》表现了当地村民的婚嫁习俗（说的是姑娘出嫁时，父母和兄嫂以及姐妹围住她，千叮咛，万嘱咐，劝慰姑娘到了婆家所要注意的事项）：

一劝那姑娘家哟，你娘家里生长大吔，你娘家好比个在婆家吔，你说话也说话，要秀哦雅。

二劝那姑娘们呢，你绣房啊紧关门罗，绣啊绣得个女人能那，赛过也，赛过多少人啰喂。

三劝要哭嫁吔，你改姓到婆家哟，娘一说话你要听话也，免得吔，免得逗咒喂骂。

四劝那出了嫁哟，你改日到婆家哟，你大事小事嘛莫差吧哟才算呢才算，在行哦家。

五劝那记心怀哟，你茶饭莫要捱哟，你走东去西嘛你要快哟，你早去哟早去，早回哟来。

六劝那记心上哟，你说话嘴莫犟哟，你哭脸把作笑脸当哟，才算呢才算在哟行。

七劝那姑子多哟，针线各做各哟，同桌吃饭嘛一屋坐呢，你莫分呢莫分你和呢我。

八劝弟兄嫂呢，妯娌要和好呢，不要时常嘛把嘴吵呢，你还要哟还要哦大让小。

九劝你公婆哟，说话迈嘴莫多哟，那年轻之人迈有差错哟，你好好呢来教来好好说。

十劝那一家人呢，你莫起二样心呢，劳碌辛苦是运生成呢，你有命呢有命呢，



焦石民歌实景演出剧照（杨风容 供图）

不由哦人。

十劝劝完了哦，你牢牢紧记到哦，
不出是非才是好哦，才算呢才算，你乖
哦巧。

《哥哥的糍粑月亮大》表现了男女
青年在中秋之夜幽会时的情景：

（领唱）八月中秋，月儿圆啰，家
家户户，不得闲哟。打糍粑哟喂！

糯米香，糯米甜，想起么妹好缠绵，
糍棒舂到碓窝头哟，么妹啥，不见么妹
好心烦。

糍粑香，糍粑甜，团团圆圆妹跟前，
哥哥的糍粑月亮大，哥哥啥，照到你我
好团圆。嗯嘿、嗯嘿、嗯嘿、嗯嘿、嗯嘿、
嗯嘿、嗯嘿、嗯嘿……

3. 劳动类的焦石民歌

《栽秧歌》表现了当地村民栽秧的
欢乐场景：

（领唱）大田栽秧行呢对行啰呵，
一对哟秧鸡啰。（众人合）在也歇凉啰呵，
（领唱）秧鸡啰找到哟，歇也凉的处
啰呵，少年郎的歌也，（众人合）撒子个，
小姐呀找到社，少年的郎哟嘿。

（领唱）十七八岁不也唱的歌哟呵，
那二十哟四五啰（众人合）事也情多也
诶，（领唱）三十哟一二啰，当也家的
去哟，少年郎的歌也，（众人合）撒子
个，哪有哟闲心社，唱山的歌哟嘿。

（领唱）你歌哪有我也歌多也诶，
我歌也撒满啰，（众人合）撒子个，
（领唱）对也门坡哟哦，随便啰跟你
哟……

《砍菜歌》反映了一位姑娘清早上

坡砍菜的情景：

清早起来，轻轻把门开，么妹走出来，
扯一琅琅，咋一琅琅，扯一个琅琅一扯
长，么妹到地里去哟砍菜哟喂，那细的
就过扯，那大的就过砍，那甜菜、白菜、
苕蓝、青菜、包包白菜，依哟，吃都吃
不完啰，我的个么妹子……

由此可见，焦石民歌歌词的内容丰富，
情感质朴，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富于
变化，易于传唱。歌词中蕴藏着劳动人
民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和祈盼，具有独特
的艺术风格和地域特色，堪称涪陵区的
民间文艺之瑰宝，正逐步成为具有地方
特色的文化符号。

三、有位为焦石民歌呕心沥血的人

涪陵的焦石民歌节已进行了五届，
然而，在那绚丽多姿的舞台背后，在那
原汁原味的演出背后，有一位为焦石民
歌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呕心沥
血、无私奉献的人，他就是焦石民歌一
至五届实景、舞台演出和广场演出主创
团队的核心人物——总导演孟少伟。

在涪陵，说起孟少伟，涪陵人并不
陌生。这位多年来一直活跃在涪陵文艺
舞台上，几年前从群文系统退休的文化
名人，生在重庆主城，长在重庆主城，
如今虽然已退休，但仍待在涪陵。为的
啥？为的是他无法割舍的“非遗”项
目——焦石民歌。

18岁那年，孟少伟从重庆主城考入
涪陵歌舞团，有20多年舞台生涯的他
因腰伤转入涪陵区文化馆工作，成为了

主抓业务的副馆长。也许是出于对“非遗”项目的珍爱，出于对焦石民歌的痴迷，出于对发展涪陵文化事业的责任，从2012年7月开始，孟少伟带着他亲自点将组建的主创团队，冒着酷暑和严寒，数十次深入到大山深处的涪陵区焦石镇的农家，聆听、收集、整理焦石民歌。他说：“这些浸润着浓浓乡土气息和泥土芬芳的焦石民歌，决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失传，必须花大力气抢救那些极富特色的焦石民歌的旋律，抢救那些蕴藏着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期盼的焦石民歌的歌词……”

在有关部门尤其是焦石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孟少伟提出了焦石民歌歌词、曲调抢救性收集整理的具体方案：从村社到全镇的焦石民歌大赛、焦石民歌歌王评选、焦石民歌集、焦石民歌视频集、焦石民歌进课堂、焦石民歌队、每两年一届的焦石民歌节等众多的实施计划，均得到了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在孟少伟的努力下，这些计划一一得到

实施。

为了保护、传承好焦石民歌这一“非遗”项目，重头戏是每年一届（后改为多年一届）的焦石民歌大型实景演出。从2013年起，孟少伟多年没有回过一次重庆老家过春节，在他看来，将焦石民歌这一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焦石民歌的首场实景演出一举成功是天大的事，其他任何事情都分不了他的心，他的灵魂已经与焦石民歌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2013年11月初，为了首届焦石民歌节大型实景演出达到预期效果，让区内外广大观众和全国的专家学者来观看焦石民歌的首演后，能深深地记住焦石民歌，爱上焦石民歌，孟少伟吃住在焦石镇，废寝忘食地工作，从歌词收集到提炼，从音乐整理到制作，从服装、舞美设计到每个节目的排练，作为总导演的他都要亲自参与，不漏过每一个细节，个中甘苦，只有他心里最明白。

2014年2月，焦石民歌被评为重庆



焦石民歌实景演出剧照（杨风容 供图）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了能让焦石民歌走得更远，唱得更响，2017年秋，孟少伟提出：除保持焦石民歌大型实景演出外，必须要有一个浓缩的舞台版的焦石民歌演出，以便外出巡回演出，最终到重庆主城甚至进京向全国人民汇报演出。而舞台版的焦石民歌演出就只需要几十名演员，在灯光设计、舞台美术、表现手法、音乐呈现等方面都要作较大的改动，这一艰巨的任务再次落在了孟少伟的头上。

于是，孟少伟继续深入基层采风，再次收集焦石民歌的原始素材，把打闹草、石工号子、哭嫁、上梁歌、砍柴歌、盘歌等单纯的个人演唱，变为二重唱、合唱、女声表演唱、男声表演唱、男女对唱等多种演唱形式，同时加上伴舞和情景表演，然后再在伴奏音乐的制作上下功夫，在保持焦石民歌原生态特点的基础上，注入更丰富的音乐元素和表现形式，最终，浓缩的舞台版焦石民歌的演出大获成功。2019年，为了在涪陵广泛普及焦石民歌，孟少伟又搞了广场版的焦石民歌的演出，上万人一起传唱焦石民歌。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以来，孟少伟又多次利用焦石民歌的调子，填上新词，来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然后带领焦石民歌队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厂矿，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他的这一做法，得到了主管部门的支持和肯定。

三年前，孟少伟从涪陵区文化馆退休了，他本应回到重庆主城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可他却是在涪陵申请了公租房长住下来。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已经担任了五届焦石民歌节总导演的孟少伟，是割舍不下焦石民歌，他要长期待在涪陵，潜心研究保护和传承他为之付出所有心血的焦石民歌，继续为筹划第六届焦石民歌节奉献智慧和余热，力争早日将焦石民歌打造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5年春节刚过，孟少伟又忙碌了起来，开始修改第六届焦石民歌的实施方案。孟少伟说：“现在退休了，更有时间和精力来深入研究和打造焦石民歌。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焦石民歌唱出国门，唱响国际舞台，让焦石民歌早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焦石民歌的旋律里浸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歌词中蕴藏着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乡音中蕴含着浓浓的乡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地域特色，堪称涪陵区的民间文艺之瑰宝，已成为具有涪陵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

（作者单位：涪陵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退休）

责任编辑：张 莉

铁峰苍苍话“歇凤”

钟 灵

俗话说“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地处万州区、开州区、云阳县三地交界，主体位于重庆市万州区东北部的重庆铁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属国家级森林公园AA级景区。公园森林面积91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95%。园内有森林植物869种，森林动物500余种。这里山岭起伏，森林茂密，溪河流泉，跌宕生姿；景观集“雄、险、奇、俊、美”于一体，富于季节变化，四季可游，无时不美，是重庆市歇凤山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域，

也是三峡库区重要绿色生态屏障。走进处处青山绿水的铁峰山乡，能听到许多世代流传、与“凤凰”有关的民间传说，昭示铁峰与“凤凰”的不解之缘，为这片乡土增添了独特魅力。

铁峰山也叫歇凤山。清咸丰《万县志》称“其形如凤”，铁矿多，故名。作为川渝地区一座标志性的山脉，“铁凤山”在诸多典籍，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川通志》《夔州府志》等中均有所提及，清乾隆《万县志》中更称其为“县



铁峰山国家森林公园鸟瞰（杨文龙 摄）

治之少祖山也”。凤凰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神鸟，寓意高贵、神奇、吉祥、美好。在铁峰，“歇凤山”的传说家喻户晓：相传，很多年前，一位王者见铁峰山三面地势险峻，唯有一面略有坡度，是易守难攻之地，于是决定在山顶建造皇城。在破土动工仪式那天，恰巧飞来一只金凤凰歇脚，王大喜，于是便命名此山为“歇凤山”。这则神话传说，一方面反映铁峰山的地理样貌：“三面地势险峻，唯有一面略有坡度，是易守难攻之地”；另一方面，“王”选择在这里的山顶“建造皇城”，说明这里地理位置优、环境好，与铁峰地处万州、开州、云阳三地交界处的地理优势相呼应。

下面这个版本的《铁峰山的故事》里，“歇凤山”的金凤凰，很有灵性，“苦修”成正果，颇有个性色彩。传说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大周溪畔有金凤凰和螃蟹，分别在凤凰庙和螃蟹寺里苦修。金凤凰曾嘲笑螃蟹矮小，只能在地上爬。千年后，螃蟹终于苦修成精，金凤凰害怕受到螃蟹的报复而离开。受土地神的指引，金凤凰来到西北角的一座山峰落脚。在这里，一改过去目中无人的旧脾气，苦修苦练成为正果，被玉皇大帝封为凤凰仙子。金凤凰虽然成仙，还是留恋过去住过的大山，常常飞到这里，帮老百姓做过很多好事，使山乡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老百姓为了感谢她，就在山顶上修建大庙，给这座山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歇凤山。时间久远，代代相传，

“铁”“歇”谐音，不知哪一代把音传错，把“歇凤山”喊成了“铁峰山”。

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传说的产生根源：铁峰山森林密布，山间飞瀑叠泉，奇花异草，各种珍奇走兽飞禽生活其间。自然神奇，山色美好。于是，便有乡夫野老在辛勤劳作之余，观察着乡土的种种事物，欣赏起山间田野的自然样貌。人们在葱葱郁郁的山间看见五彩飞鸟的影子掠过，看见大山连绵起伏，状如飞鸟之翼，于是便有人说：看，我家门口的山，多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啊——人们取其美好象形及寓意，加之山间多产铁矿，也作“铁凤山”。

铁峰乡境内的凤仪禅院是渝东北地区佛教的“风水宝地”，始建于明朝，清乾隆年间（1736—1796）达到鼎盛时期。相传古时歇凤山一带长满了高大的梧桐树，每当太平盛世，常有成群的凤鸟从西方飞来栖息，为万州祥瑞之兆，后来人们便在山巅修建了“凤仪禅院”。从“铁凤山，在治北四十里，崇冈绝壁，其形如凤，旧有道观。”（清咸丰《万县志》）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凤仪禅院旧时曾经是一座“道观”。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蜀汉炎兴元年（263），佛教传入万州。明清两朝，佛教达到鼎盛时期，取代道教成为万州境内第一大宗教。凤仪禅院不是因佛教而兴，其前身为当地百姓开展道教活动之所，其历史已久。历史烟尘漫漫，凤仪禅院究竟建造于何年，不得而知。1949年以后，

万州佛教活动逐渐停止，多数僧尼还俗返乡从事生产活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凤仪禅院被毁。1999年5月，凤仪禅院在原址重建后恢复开放。如今已在原址上重建了气势恢宏的凤仪禅院，恢复了养儿窝、照林和尚寿塔、朝天门等景点；而关于凤仪禅院内歇凤台、钟楼、灵光殿、铁树、晒经石、古水井等传说比比皆是。

歇凤山及凤仪禅院都有“凤”字，传说它们与李白到万州登太白岩有关。李白曾三次到万州（南浦）求道小住，并留下了李白“大醉西岩一局棋”的典故。这个典故里，有一只神奇的凤凰——相传李白在西岩上饮酒对弈，日落黄昏，晚霞中飞来一只五彩金凤，口衔金壶，



凤仪禅院山门（汪昌隆 摄）

飘落在李白身边。李白举起金壶豪饮，而后抛去金壶，仰天大笑，乘金凤飘然而去。凤凰歇脚的地方就是“歇凤山”。从这个诗意的传说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逻辑：李白乘凤凰而去，成仙羽化，投影的是李白一生的诗意。李白信奉道教，因太白岩有“绝尘龕”，吸引李白登临南浦西山，访仙道，读经书，赏题刻。人们崇拜李白，许多人心生仰慕却不得亲见，于是“凤凰”把李白带到了“歇凤山”，凤仪禅院因而成了道教名胜之地。这多多少少表达了人们对李白敬仰追随。

凤仪禅院现在所在的位置与过去的凤仪禅院（在养儿窝附近）稍有偏差。铁峰乡箭楼村与开州区交界的一处山崖下，有一处遗址，是原天元寺遗址。凤仪禅院是由天元寺发展而来。站在天元寺遗址处，向东南方向望去，一座山脉绵延舒展，被当地人称为“凤凰展翅”，凤仪禅院正隐身于此山密林深处。

相传天元寺是当地方圆几百里最早建立寺庙的地方，站在高处，远眺天元寺的山形，有五龙奉圣之景象。人们都认为此处很有灵气，于是寺庙香火旺盛，每逢月初一、十五，方圆百里的香客络绎不绝，特别是每年六月十九日的庙会，此处更是人满为患。

因天元寺位于崖下坡地处，地势较为狭小逼仄，容量有限，于是天元寺就分支成若干支庙，最先成立的支庙是歇凤山“凤仪禅院”，然后有铁佛寺、雷坪寺、白母寺、熊鹰寨的神龙庙、民国

场的老鹰庙、蜂窝灯的牛王庙等。大凡云阳、开州、万州三地来铁峰敬香者，首先必敬天元寺，然后才到其他寺庙敬香。

天元寺香客络绎不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后于1966年被毁。年纪较长的老人都记得天元寺。现在天元寺遗址处，还保留着数尊残碎的石造像。这些佛像，有的手捧仙桃，有的手执拂尘，有的两手交叠趺坐……雕刻手法流畅精美，服装纹饰细致入微，尽管无法看到面部表情，姿势、体态却稳重大气，栩栩如生。据当地人讲，每尊佛像都有对应的佛教故事。

翻过天元寺遗址背后的山梁，即为开州地界。人们传说刘伯承将军当年在川东一带闹革命时，还从山上的小路走过，并从离天元寺不远的千年古井中取水饮用。

铁峰乡主要为山地形态，这里的崇山峻岭间，分布有很多岩溶洞穴。人们根据其造型奇特的地形地貌，创造出“落水孔”“金龙会狮”“狮子包”“螃蟹沟”“鹰嘴岩”“大乌龟背小乌龟”等美丽传说。也有很多仙女故事，如“上山乌龟藏仙女”“洞子梁”“石锣石鼓”等。这些故事的共同点就是：在风景优美的铁峰地面，或溪河之畔或密林深处，仙女们因之而快乐地来到人间生活——言下之意，铁峰有多么美丽！这样美丽的地方，甚至赛过天庭！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好家乡的颂赞，充满乐观、

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过去，铁峰一带道教、佛教文化深厚，这样的文化厚土，培育出“庙坝”“观音庙”“龙凤桥”等传说故事，反映过去铁峰居民常常面临天干大旱、山洪暴发等极端天气，人们勤劳勇敢，积极与大自然抗争，同时虔诚祈福上天普惠恩泽，风调雨顺。于是便有了铁峰及周边百姓祈雨的程式，道士做法；每逢初一、十五及年节，到观音庙烧香搭红，祭拜观音等民俗。传说故事中还巧妙寓意世人要心怀善良，多行仁义，才能和睦幸福。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民间传说中，已经蕴含原始的“生态观”思想，反映出古人对“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思索。通过这些绘声绘色的传说故事，告诫人们如果对大自然盲目征服与破坏，人与大自然处于紧张、对立的状态，就会得到不好的后果。最具代表性的是下面这个“姜石匠与犀牛”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歇凤山上有一对犀牛母子，悠闲地啃着山中青草、树叶，吃饱后就躺在山林里纳凉休息。一日，小牛贪玩走下山来，远远望见清清的河水，直奔到水里痛痛快快地洗澡。寻味而来的犀牛妈妈带着子牛慢慢悠悠来到开县道罗湾，被一片金黄的稻谷吸引，放开肚皮吃个精光。说来也怪，神牛吃下稻谷，出来的仍然还是稻谷，并且流入大溪沟（注：大溪沟在铁峰乡境内）的粮仓里。一天天过去，粮仓再也装不下，百姓怎么吃也吃不完，当地百姓过着不劳而获的悠闲日子。不

过好景不长，消息传到开县受灾的农民耳里。当地有名的姜石匠抓起石斧找到正在河里玩耍的犀牛，抡起斧头照着犀牛的脖子狠狠砍下去，顿时鲜血染红整条河流。小牛在追打之中不知去向。当时，大溪沟住着一位清朝的陶翰林，他母亲去世了。出殡那天，因前几日大雨，路面湿滑难行。有人就建议说，反正粮仓的稻谷一直吃不完，装不尽，不如拿些来铺路。陶翰林也没多想就一口答应。等众人出殡回家，才发现粮仓的稻谷一粒不剩。原来，稻谷铺路一事被天庭知晓后，便下令收回了所有的粮食。

铁峰的茶产业历史悠久，其茶文化中也有与“凤凰”有关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一只金凤凰飞来铁峰山，看到这里山清水秀、民风纯朴，便将口含的一粒金色的茶树种子播下。从此，铁峰山处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茶树，且因茶叶品质优良，味道醇香回甘，深受人们喜爱，勤劳的当地老百姓收入因之而增加。为了感谢金凤凰，人们就在铁峰山大垭口主峰、当年凤凰停歇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寺庙，并取名“歇凤寺”，世代朝拜。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绵延数十公里的铁峰山脉有茶园上万亩，茶场（厂）十几家，除开县的兼善、汝溪，梁平的城东外，万州就有铁峰茶厂（现重庆神峡茗枫茶叶有限公司）、大垭口茶场（厂）、大碑茶场、金竹茶场（现万州区万竹茶叶有限公司）、后山茶场、孙家茶场（现重庆市渝云峡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铁炉茶场、弹子茶场等，生产的“凤凰春”“凤凰春尖”“凤凰春毛峰”等系列名茶多次获省（市）级名优茶奖。如今，依托良好生态资源，铁峰乡已经发展起茶叶、杨梅、猕猴桃、翠玉梨、翠冠梨、中药材、果酒等多种农产品产业，真的有了让群众安居乐业的“金凤凰”了。

铁峰苍苍，森林巍巍。自古以来，铁峰山以生态环境良好、风景优美著称。受铁峰山旖旎风光的吸引，历代多有文人墨客来此游览，并以诗作歌咏铁峰山。明代易学大师、理学家和诗人来知德对铁峰山颇有偏爱，其著作《来瞿唐先生日记·外篇》中辑《铁凤稿》，共收入诗作28首，为铁峰山留下了一笔绚烂的文化遗产。此外，清代万县贡生、诗人、书法家罗永植，清万县举人王子珍等都留下诗作，可从中品味其多姿多彩的悠长雅韵。铁峰乡境内有凤仪禅院、开元寺遗址等历史遗迹，有牙齿顶板凳、舞狮、彩船等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乡村文化，有万开古道等人文古迹，有鹰嘴岩、狮子包等自然奇特地形地貌，优美的自然风景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交织，使得铁峰山成为一处享誉川渝地区的风景名胜。

（作者单位：万州区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责任编辑：张莉